

鹿寨文史资料

—
第九辑
—

回眸多少感慨事

风物长宜放眼量

政协鹿寨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委会

《鹿寨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主任：郑一鸣

副主任：覃清培

刘华桂

编委：韦乾林

刘克林

刘江平

黎耘（特邀）

《鹿寨文史资料·第9辑》

内容简介

2008年，政协鹿寨县委员会继续收集出版《鹿寨文史资料·第9辑》

本辑根据收集到的稿件，除继续保留《沧桑巨变》、《杏林春秋》、《教海烟波》、《人物画廊》等栏目外，另外新开设了《战争史话》、《峥嵘岁月》《历史回眸》、《青春留痕》、《艺苑拾遗》等栏目。

《鹿寨文史资料·第九辑》

目 录

◆ 沧桑巨变 ◆

春华秋实结硕果 留给后人一路歌

——鹿寨县全境解放概述 吴 狄 1

民末至上世纪六十年代鹿寨县城的市政设施 蔡传清 11

◆ 战争史话 ◆

鹿寨县境解放前军事动员考略 梁德荣 16

洛清江上的锁江链 黄小斌 20

◆ 峥嵘岁月 ◆

从湘潭到鹿寨 张丽华 23

黄冕剿匪的日日夜夜 王应常遗作 29

难逃法网——残匪王启章沈振儒沈子高覆灭记

..... 徐运武 林润德 韦高平口述 路 德整理 41

长盛剿土匪 莫 杰 45

夜半枪声驱土匪 谢永宁 48

如歌岁月旧履痕——鹿寨农村工作回忆录 沈光明 49

◆ 历史回眸 ◆

我县 1953—1956 年粮食生产和统购统销概况 翟从森 59

鹿寨县人民公社化始末 沈光明 62

◆ 青春留痕 ◆

绿化鹿鹰公路 路 德 65

青年突击手 路 德 66

在修筑鹿化铁路的日子里 廖学敏 67

◆ 杏林春秋 ◆

鹿寨县医疗卫生事业的演变和发展	覃德礼	69
普种牛痘 消灭天花	汤英能	73

◆ 教海烟波 ◆

雒中忆旧	杨 骥	75
------------	-----	----

◆ 艺苑拾遗 ◆

鹿寨的文场、“文明戏”和“洋歌”	韦 仕	77
------------------------	-----	----

◆ 人物画廊 ◆

壮族文人韦晓萍	沈光明	79
黄埔军校同学会（鹿寨镇籍）名录.....	陈胡雄 杨作宽	84

春华秋实结硕果 留给后人一路歌

——鹿寨县全境解放概述

● 吴 狄

解放前没有鹿寨县。当时，全境有三个县另外三个乡。

三个县是：雒容县，辖今雒容镇、江口乡、导江乡及今鹿寨镇的二分之一；中渡县，辖今中渡、平山两镇；榴江县，辖今寨沙镇、拉沟乡、黄冕乡及今鹿寨镇的二分之一。三个乡是：修仁县二区的四达、十锦、峒底，即今四排乡。

上述三个县及三个乡，1949年初冬是如何解放的？且听在下逐个分解。

（一）

话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位战将陈赓、肖劲光和李天佑，分别指挥四兵团、十二兵团及十三兵团三路大军 10 个军共 45 万兵力，于 1949 年 11 月 6 日从四面八方分进合击白崇禧集团，国民党残留在广西境内的 40 万军队，顿成惊弓之鸟和丧家之犬。驻守在桂林至柳州铁道沿线的国民党五十六军三二九师、交警总队两个大队以及林秀山的桂林绥靖公署三支队主力，慌忙南撤柳州和远离铁道，躲进山区，以避兵锋；沿途县城、乡镇，只留少数警卫部队。国民党政府之各级组织，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时全县境内的三个县政府——雒容县政府撤至导江乡；中渡县政府撤到四十八弄中的茶胆村；榴江县政府撤往志勇村，三个县城均由常备队及警察守卫。

1949 年 11 月 29 日晚 7 时许，人民解放军前锋部队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四 0 四团 3000 健儿，在团长冰野和政委卜占亚率领下，沿湘桂铁路飞速南进，抵达黄冕、幽兰一线。此前，国民党军队逃跑时为阻挡、滞迟解放军追击，除破坏铁道、桥梁以外，还纵火焚烧车站及数千吨军用民用物资，此时正烈焰冲天，映红夜空，声震山谷。团长冰野除令尖兵连、侦察连继续追歼逃敌外，部队不得不停止前进，全力扑灭烈火，抢救物资，修整桥梁铁道，为后续部队开路。

11 月 30 日清晨 7 时 30 分，四 0 四团侦察连、尖兵连在长塘村及火车站歼敌 200 余名后，解放了如今鹿寨县城（当时是榴江县的一个镇），半小时后，全团主力抵达，国民党的军队及其它反动武装，早作鸟兽散。

部队稍作休整，吃了干粮后，继续沿铁道和公路前进，中午 11 时 20 分，解放了雒容县城。因柳州已于 11 月 25 日为我军十三兵团三十九军先予解放，故四 0 四团改抄小路，沿洛清江顺流而下追击逃敌。12 月 1 日清晨 8 时 10 分，四 0 四团侦察连、尖兵连在磨石冲与敌雒容县自卫总队步兵排哨遭遇，部队一个冲锋即将其全部歼灭；后续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击导江圩，国民党雒容县政府人员及其自卫总队，除极少数人沿小河跳江涉水逃命外，都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当人民解放军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四 0 四团在鹿寨境内铁道两侧跃

马挥戈，横扫残敌之时，四十五军另一支劲旅——一三四师四〇二团 3000 健儿，也在向鹿寨境内奋勇进军，目标是解放榴江县城。

1949 年 12 月 2 日拂晓，四〇二团经永福县堡里乡古面村，翻山越岭进入榴江县安顺乡（即今拉沟乡）。同一天，该县非党领导的民变武装“榴江县人民解放总队”围攻志勇村（何谓“民变武装”？即不是共产党领导，但也反对国民党的武装集团，犹影片《独立大队》之类）。国民党榴江县长龙泽应及其自卫总队 120 余人投降；原国民党雒容县长谢振中，也在该村被俘。下午 2 时 10 分，四〇二团先头部队进抵八见村，与“榴江县人民解放总队”汇合，并继续前进。傍晚 6 时 40 分，解放了榴江县城寨沙镇。逃跑到此的国民党雒容县长黄公吾及鹿寨镇长温致仁，目睹“破船下滩”，大势已去，分别率部缴械投诚。

在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的情势下，中共广西地下党领导的桂中区游击武装，亦于 1949 年 12 月 1 日下午，一举解放了原修仁县二区的四达、十锦、峒底三个乡（即今四排乡），并建立了民主政权。

我军前锋部队横扫残敌，肃清县境内铁道和公路沿线敌人武装并摧毁其反动政权后，肩不离枪马不停蹄，继续南征，围歼逃跑的敌军主力。后续部队解放军四十九军一四六师四三八团，随即进驻鹿寨境内各地。

1949 年 12 月 10 日，跟随解放军南下的地方党政工作团人员抵达雒容、寨沙镇，13 日，分别成立两县中共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中共雒容县委书记林芳（雒容县人，1938 年到延安“抗大”学习；1949 年秋，任入桂作战的解放军某师政治部副主任）；县长周春鸣。中共榴江县委副书记李云亭（50 年 3 月，升任书记），县长郭冲霄。

至此，鹿寨县全境原来三个县已解放两个县及曾属修仁县之四排乡，并都建立了党政组织，迅速领导人民群众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唯有当时的中渡县，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统治之下，虽系残敌孤军，仍然困兽犹斗。

（二）

且说国民党军队五十六军三二九师九八五团、交警总队两个大队及匪首林秀山的桂绥三支队共约 4200 余人，虽盘踞平山镇，但中渡县长陈伯明还是害怕解放军奔袭围歼，已将县政府迁至四十八弄山区的茶胆村；古城中渡，只留下警察及常备队踞守。此人当过上校团长，有一定军事知识与作战经验。他除了留下 100 余人驻守东、西、南、北四个城楼及县政府外，其余兵力，则沿洛江左岸，摆了一个“三点长蛇阵”，即在通往茶胆村的山湾、下莫及香桥岩路口等地，各配备了一个 40 人左右的加强排；在古城中渡的制高点西眉山上的炮楼，还放一瞭望哨，以便随时报警。县政府只留他的主任秘书视事，他则躲进茶胆村遥控指挥。1949 年 12 月 16 日，解放广西的战略总预备役——人民解放军四十九军一四六师的四三八团，派出侦察股长刘双和及作战股长李仁堂，率领一个 160 多人的加强侦察连，奔袭中渡县城，顺便侦察盘踞平山镇的敌军情况。

当天是中渡圩日。清晨，洛清江上的薄雾还未散尽。侦察连一律便衣装扮，混杂在赶圩的人流中，了无声息地渡过洛清江，由鹿寨城向中渡古城进发。他们的 USA 汤姆逊冲锋枪及德国造快机驳壳，用蓑衣挡住；USA 卡宾枪及加拿大轻机枪，则捆成柴禾与甘蔗，人挑肩扛，活脱脱一副小商小贩、挑夫苦力模样。事后得知，当天与他们同行赶圩的人，竟无一人识破。

出发前，团司令部命令他们，既要利用赶圩人流便于接近中渡城，但又不准随便开枪，以免误伤群众。侦察兵们于是决定采取迅猛的战术动作，智取中渡城，必要时，不惜肉搏拼刺刀解决战斗。

上午 10 点 20 分，侦察连 160 多人抵达中渡县城南门外体育场（今粮所、汽车站一带地方）。西眉山上敌人的瞭望哨、东西南北四个城楼及县政府的敌兵，完全蒙在鼓里。侦察连一个排直扑县政府，其余四个排分别向四个城楼神速运动，按统一规定：10 时 40 分发起冲击，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如《孙子兵法》所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力争不开一枪而占领、解

放古城中渡。

此时，四周城楼上的敌兵，有的正在吃中午饭；有的昨晚赌了个通宵还不过瘾，仍在“推牌九”或“抓摊”；有的下岗后，则在圩场闲逛，强买强卖，白吃白喝……他们压根儿也不会想到，一把铁钳正在张开，五柄利剑已经出鞘，160多支箭头开始弯弓等发，他们的末日到了！

10时40分，说时迟，那时快，中渡县城东、西、南三个城楼及县政府，同时出现了便衣武装，又几乎是同时响起了“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吼声。当敌人清醒过来后，驳壳枪、冲锋枪、卡宾枪早已顶住他们的胸膛，一个个呆若木鸡，乖乖地做了俘虏。

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是西门城楼（今中渡小学前门右侧）敌人及西眉山的敌瞭望哨兵被俘经过：当我军神勇的侦察兵冲上城楼时，有8个敌兵正在“推牌九”和“打牌”，其中一个班长模样的家伙，听见侦察兵的吼声时，竟然昏头昏脑地说：“不要吵！吵什么X？想过瘾，就坐下来！”侦察兵们亮开身份后，这家伙和几个敌兵立即瘫软在牌桌下。当其时也，西眉山上敌人哨兵刚好到此处换岗准备吃中午饭，侦察兵告诉他：“跟我们走就有饭吃，不用上山了！”他看到同伙被俘，顿时傻了眼。只有少数敌人由北门逃出，跑进四十八弄山区。

就这样，人民解放军一个160多人的侦察连，仅用20多分钟，不费一枪一弹，就兵不血刃地解放了中渡县城。

入夜，侦察兵们悄然撤出古城中渡，隐伏在洛江两岸，审俘虏、查敌情、探路线、绘图标，几支巨大的红色箭头，在《敌我态势图上》，直指茶胆村与平山镇。

1949年12月28日拂晓，解放军四三八团三营两个连队进击茶胆村，一举摧毁国民党中渡县政府，其常备队和警察等反动武装及县长陈伯明等，全部被俘。

（三）

却说1949年12月29日午夜，解放军四三八团开始奔袭平山镇。团长王英清、政委江洪洲及团参谋长张生奎，靠前指挥，分别随各营行动。一营由柳城县东泉镇，二营由今平山镇大阳村、孔堂村的哑巴坳，三营由今中渡镇朝阳村石燕坪、柚子坳、青山村，分进合击，矛头直指平山镇敌司令部，“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首先乱其指挥系统。

30日拂晓，战斗分别在平山镇周围打响。敌我双方，短兵相接，炮火连天，杀声震地，弹雨血花，星月变色！其中，尤以突破禾道村防线、争夺福园寨制高点和攻击碑头村堡垒三处，战斗最为激烈。敌军凭借有利地形和美械装备优势，拼命抵抗。我军官兵则短促突击，连续爆破，奋勇冲杀。二营五连作为全营“尖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哑巴坳守敌，一路攻击前进，在敌重兵设防的碑头村，与守敌展开血战，反复冲杀，刺刀见红，以少制多，令敌丧胆，将其全歼。其他各路“尖刀”连、突击队，亦相继歼敌，进展神速。在我全团近3000名官兵勇猛冲杀、穿插、分割、合击中，敌4000多人顿时瓦解，溃不成军，仅三营七连军械员邬凯等4名战士，一次就俘敌官兵162名。敌九八五团团长江明德及桂绥三支队司令、惯匪林秀山等在战斗打响时，与我军合击圈外之敌慌忙经屯秋村逃蹿融安县的泗顶乡。

是役至12月30日上午8时20分结束。计歼敌千余名，其中毙、伤175名；缴获六0迫击炮4门、轻重机枪19挺、长短枪438支、手榴弹1368枚、战马28匹及军用物资一批。我军亦伤、亡70余人。

1950年元月5日，解放军四三八团又以中渡县城为前进基地，长途奔袭泗顶乡之敌，除梁明德、林秀山及少数随从漏网外，全部被歼灭（半年后，梁明德在鹿寨镇附近农村；一年后，林秀山在大瑶山重点剿匪中，均被我军活捉）。至此，鹿寨全境及周边各县的国民党军队被全部肃清，全境解放，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制度与人民政权，从此在洛清江两岸诞生。

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逃往台湾以后，还有一份《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所以，曾发生全国性的土匪暴乱，新生政权建立之初，境内武装斗争仍很激

烈。不过，那是巩固政权，剿灭匪患，为别一种形式、内涵的战争了人民解放军四三八团作为人民卫士、专政柱石，亦始终参与，驻剿追剿，奔袭突袭，直至匪患肃清。

1951年4月15日，全县匪患剿灭根除。中共广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经中南军政委员会报请中央批准，同年6月29日，撤消原雒容、中渡、榴江三个县建制，以此三县辖区合并修仁县二区的四达、十锦、峒底三个乡，成立鹿寨县，首任县委书记李云亭，县长石庆瑞。

春风秋雨，晨雾夕阳，六旬岁月，沧桑巨变，抚今追昔，感触万千！笔者胸中禁不住涌动诗情，凑成七言绝句一首，且为本文作跋：

弥漫硝烟逐逝波，金戈铁马壮山河；
春华秋实结硕果，留给后人一路歌。

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鹿寨县进军示意图



(据当年解放鹿寨县解放军部队的《行军作战日志》绘制)

民末至上世纪六十年代鹿寨县城的市政建设

● 葵传清

鹿寨始建于明朝。明正统五年（公元 1440 年），时称“牛摆”村。清代后建镇。此时，鹿寨镇虽为“盖三省”（云南、贵州、广西）之通津，此后至民国末年的 510 年里，建设十分缓慢甚至停顿，城镇总面积无扩大，市政建设原始。解放前，鹿寨镇的总面积约 2 平方公里。东起甘洲村及“老鼠塘”一带，即现今建中市场靠大桥路一边。当时还无住家，只有加工黄糖的榨糖厂。西至大源街、新风街尾一带。北起沿洛清江的盐埠街，也叫“磨盘街”、“夫子街”。这条街与今公安局所在地的后街相通围绕，形似“磨盘”，故名。当时，这条街住的多为“挑码担”的挑夫及豆腐作坊等，故被称“夫子街”，有歧视之意。

这一时期几项市政设施情况为：

街 道

民国末年，鹿寨镇街道狭窄、破烂。全镇共有 12 条街，街名为：镇东、交通、宝塔、南市、保泰、十字、凤凰、新安、思义、人和、盐埠、太和。街宽一般为 3—7 米，全长约 3000 米，路面均为“三合土”和“沙泥土”。十字街多为商家住地，较为平整，其它均凸凹不平。当时，人们出行，一般为步行，富家人出行最高级的也就是骑马、乘轿，故街道宽窄设置，适应了当时出行的要求。

1951 年 6 月 25 日，榴江、中渡、雒容三县合并为鹿寨县后，开始对街道进行修缮。五十年代对部分不平的地段进行平整。六十年代在主要街道进行全面翻修。1965 年 7 月，县财政拨款 6696 元，对十字街、南市街等主要街道进行翻修，路面用料仍为石灰、河沙、泥土“三合土”打成。为方便居民出门乘坐火车，当年还对火车站路进行修缮。

路 灯

解放前夕，鹿寨镇无发电设备，居民照明用煤油和桐茶油。路灯亦为煤油和桐茶油灯。民国中期前，鹿寨镇无路灯设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 1932 年），新桂系统一广西，曾发出建设指令，飭令各地设置、改善街道照明。鹿寨镇即由商家发起，动员各商家捐资设置街灯。当时，购置路灯 30 盏，这种灯为三角形，高约 20 公分，用三块玻璃镶嵌，以防风吹，每块玻璃宽约 12 公分，灯顶有一灯帽防雨。路灯设置的位置主要是每条街道的街头和街道转弯处，灯挂在特设的木柱上。逢年过节，居民为增加自家门前的喜庆色彩和光亮，富有人家挂上灯笼，小户人家用蜡烛插在萝卜上，置于门外铺台或门框上，穷人家则随它黑去。解放初期，路灯仍沿袭旧法，不过街灯数量有了增加。

1955 年，在实行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县人民政府与鹿寨私营民丰碾米厂兴办公私合营发电厂，装置 60 千瓦电机 1 台，以 40 马力柴油机带动，当年 5 月 1 日正式发电。从此，路灯以电灯代替了油灯。当年架设线路 3 条，线长 1600 米，共设置路灯 18 盏，灯泡为 60 瓦。这 3 条线路为：电厂（今电影院）至人民政府所在地，线长 800 米，设灯 8 盏；电厂至招待所（今鹿州宾馆），线长 400 米，设灯 5 盏；十字街口至火车站，线长 400 米，设灯 5 盏。线路架设及电费均由电厂负担。1957 年，又增设 6 条线路，总长 1550 米，种植电杆 26 根，安装灯泡 21 个。1960 年，鹿寨钢铁冶炼厂（今鹿寨化肥总厂）给县城供电，使路灯得以继续增加，当年又增加 7 条线路，总长 2200 米，装置灯泡 28 盏。1965 年，化肥厂发电厂由县接管，用电量有所增加，路灯亦有所增加，一些小巷亦安装了电灯，全城路灯增至 120 盏。

供 水

解放前夕，鹿寨城镇无自来水设备，居民主要靠肩挑洛清江水饮用。此时，沿江两岸无工业生产，江水较为洁净。不过衣物洗涮均到河中进行。为避开洗涮的污染，人们均要天不

亮就到河边挑水，于是一些主要码头清晨就人来人往，上上下下，甚是繁忙。而挑水卖，则成了一种行业。一些壮年妇女靠挑水卖维持生活或补贴家用。每担水视远近不同，收费1至3分（按现币计）不等。

解放初期，一些机关、饮食店、豆腐作坊等用水大户，则挖井取水。由于多数机关都打有水井，故安装自来水则较迟，直到1956年才开始安装自来水设备。当年3月，由县财政拨款3000元，修建县城第一个供水站，站址设在今检察院内。站房建筑面积60平方米，在检察院下面江边设一泵船，由泵船抽水至水塔供水。铺设输水管1条，水管直径80—100毫米，水管线路为水塔至大源街码头巷，管道长约600米，主要为居民供水。供水站统一出售水牌，居民凭牌挑水。随着县城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用水量的增加，1967年由县财政拨款1万元，开始建自来水厂。厂址在鹿寨镇西北面（现水塔巷83号），厂区占地2000平方米，水塔容积30立方，铺设主管道管径200毫米，管道长243米，主支管道长2340米，管径50—80毫米不等。水管多数接至各机关、饮食店、用水作坊等，居民一般尚未安装自来水。

环境卫生

民国时期的城镇公共卫生设施，主要有两项：一是垃圾清扫，二是公厕。

垃圾清扫。民国中后期，由鹿寨镇商会雇请一人负责清扫圩厂和集市地段的垃圾。当时有圩厂两处。一处在今卫生局门口街中休闲地段，面积约500平方米；另一处在今电影院左边，街心花园上面，大小与第一处相似。所打扫的集市地段多在南市街，沿至西闸塘及今商业局一带，每日圩散清扫。其它街巷，由所居住的人家清扫，垃圾堆放在城镇周边及洛清江沿江码头。堆放在这些地方的垃圾年长月久，大雨冲涮，流入江中，造成污染。1955年，为清理沿江垃圾，集中了全镇违法人员进行搬运，还洛清江一个洁净。为解决垃圾乱堆乱放的问题，1956年设专人收集垃圾。当时雇请两人，用手推车逐街收集垃圾。随着事业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人力拉车已远远不适应，1958年由县财政拨款改为马车；1961年改为4架牛车收集垃圾。1969年鹿寨镇成立清洁组，共7人，圩厂、主要街道均由清洁组负责清扫。

公厕设置。解放前夕，鹿寨镇无公厕设置，集市和公共场地，由城郊菜农在边僻处用茅草或竹篱笆作简易茅厕供人使用，以此获取肥料。1956年，由县财政拨款，在今鹿寨小学旁修建公厕1座，建筑面积40平方米，设蹲位12个。1957年又分别在今鹿州市场、盐埠街、太和街等处修建公厕4座，基本满足了当时人们出行方便之需要。

◆ 战争史话 ◆

鹿寨县境解放前军事动员考略

● 梁德荣

军事动员又叫兵员动员、武装力量动员，是国防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随着战争的产生而产生。动员的准备与实施，贯穿于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全过程。准备是“养兵千日”，实施是“用兵一时”。战时动员的大量复杂工作，要靠平时逐步完成，并逐步完善动员体制，建立起牢固的动员基础。鹿寨县境内解放前历代主要军事动员考略如下：

隋朝，开皇十年（590年），县境内始有军事动员。官府规定：“凡属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将兵编入民籍，改“兵民异籍”为“兵民合一”，“兵民分治”为“兵民合治”。所有户口均由州县管理，规定男18岁为丁，都有服兵役义务；60岁为老，方可免征服役。后期，推行府兵制，官府内设卫，培养将才，外设府（军府），以储备兵伍。兵归军府管理，平时散居务农，战时集中，临时命将统领。

唐朝，沿袭隋制，贞观年间（627—634年），洛容县府奉命规定：“凡受田农户，其男子均有服兵役义务，被检点充当府兵者，平时务农，农闲练兵，征战自备兵器资粮，分期轮流守卫京师和戍边。”后期，军事兵员动员改为招募制。官府颁布应募条件，壮丁自愿报名应募。官府于校场点兵，确定应募者为兵。

宋朝，沿袭唐代募兵制，官府规定：一旦应募，终身为兵，由官府发给粮饷，具有雇用的性质。兵分禁兵、厢兵、蕃兵和乡兵。王安石变法后，境内革除旧制，军事动员始“行保甲，训民兵”，“一岁教两月”。

元朝，前期实行全民皆兵制，以部落为单位，部族男子15岁以上70岁以下，“无众寡，尽金为兵”，“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聚牧养”。后因兵力不足，官府规定汉人可以当兵，通常20户出1兵，年龄为20岁以上。

明朝，洛容县军事动员实行招募制，招募之兵归卫所管辖，兵称“军士”，来源于“从征兵”，“归附兵”，“罪徒兵”和从百姓中征集来的“垛集兵”，即每3户出一丁，出丁户称“正军户”，其余为“贴军户”。正军户如有死亡、逃亡，则由贴军户补上。卫所之兵多数屯田，少数联防，农时耕种，农闲训练，遇有战事，则调集征战。时洛容县主要招募卫兵、弓兵、机兵三种。招募卫兵49名，保隘守兵135名。永乐十一年（1413年），属永福县辖理定、牛摆（今鹿寨）、榴江等招募兵员416名。

清朝，初时县境军事动员袭旧制，设“四旗”举旗为兵，后设“八旗”即“八旗兵制”。清末因外敌入侵，增设“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招募汉人为兵。时洛容设县团防局，由乡绅主持组编。由团防局进行兵员动员，各乡设团，联众团为练，改称团练。咸丰十年（1856年）雒容县置城厢、盘古、马步、大正、清和、大汾、大桥、大安、正本、永安、民安、德安、丹竹、中和、协和、导江、江口、大新、联运、联庆、联合、联卫等团，每个乡团为数十至百余人不等。今鹿寨、黄冕、龙江、寨沙、拉沟等乡镇，时隶属永福县辖；黄腊、中渡、平山、石墨、马安、潘圩、贝塘、大门、寨上等，时隶属永宁州辖，四排乡时隶属修仁县辖，均组编团练进行兵员动员准备。

民国时期，初期军事动员体制沿袭清制。后唐子实在桂林，仿曾国藩在湖南编练三湘子弟办法，办团练改称“民团”。雒容、中渡、榴江三县民团组织相继建立。由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新桂系为适应对外、对内战争，特别是抗衡蒋介石独裁之需要，因旧有民团既无严密组织，又无严格训练，彼此之间各自为政，其团兵良莠不齐，甚至团兵竟为土劣之爪牙，而广西省政局不定，绥靖地方有赖于民众武力，为强化军事动员，国民政府将旧有民团进行改造。民国十九年（1930年），雒容、中渡、榴江三县奉命推行“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政策，强化民团制度。县设民团司令部，对旧有民团进行组织改造、素质改造、任务改造。县民团司令部隶属庆远民团区辖。三县各设常备队、预备队、后备队三种，征编多则4队，少则1队，每队90人，征集18—30岁男性合格壮丁，施行训练。22年（1933年）奉令撤销常备队，县以下民团分编为后备队和预备队两种。按广西民团总司令部规定：凡在广西居住两年，有固定住所，年龄30—40岁的男性壮丁，编为后备队乙级队，每队壮丁9—13人为班，3—4班为排，若干排编为队；村（街）编为中队，由村（街）长兼中队长；乡（镇）编为大队，乡（镇）长兼大队长；区编联队，区长兼任联队长。后改实行“三位”一体制，即乡（镇）长兼任大队长和中心小学校长；村（街）长兼任中队长和国民基础小学校长。时三县各按甲级队组编民团预备队。21年（1932年），雒容县编组10个大队，85个中队，分别设大队长、大队副各1人；中队长、中队副各

1人；壮丁共6806人。中渡县编7个大队，66个中队，壮丁共3806人。榴江县编组9个大队，96个中队，壮丁共10784人。

雒容、中渡、榴江三县预备队，由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委派督练官下县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军事训练分学科、术科两大类。学科训练主要是游击战术、防空防毒、战场救护、间谍知识、阵地构筑、辎重运输；术科训练主要是制式教训、战斗演习、实弹射击等。县民团官佐到广西团干训部训练所培训，时间8个月；常备队由庆远民团区集训，时间6个月；后备队就地以队为单位训练，时间为180小时。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雒容、中渡、榴江三县民团干训毕业3期，共221人。三县后备队训练各进行6期，合计6327人。

洛清江上的锁江链

●黄小斌

洛清江系柳江支流。150多年前，这里曾发生了一场拦江堵击战，后人把此次江战称之为“路上行舟”之战。

广东粤剧出身的李文茂，受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弃艺从戎，不久便成为广东天地会起义军首领。咸丰4年（1854年），他会同太平军将领陈开所率之部，以广东佛山为据点，向广州城大举进发。在与守城清军交战数月之后，仍无法攻克广州。翌年，李、陈沿西江而上，攻克梧州、平南、藤县、浔州等地，将浔州定为秀京（今之桂平）。李文茂自封“平靖王”，陈开为“镇南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沿途克武宣，占象州，抵达柳州城外。经数日激战，大破柳州城。李文茂在城内大南方周家祠堂（今红星剧场）建立大成国靖王府，开仓赈济，封官设职，安抚民生，同时还铸造“平靖通宝”、“平靖胜宝”等钱币，深受百姓拥戴。

远在桂林的清军，妄图一举消灭李文茂，夺回柳州城，扬言要从水路进攻柳州。李文茂为阻止清军沿洛清江顺流而下，派其弟李文辉（又名“铁拐李”）领兵万人，火速赶到洛清江与柳江交汇处（今鹿寨县江口乡政府所在地）驻营扎寨。李文辉到达江口后，立即分兵两路修筑防御工事，一路在放马岭（今江口乡粮所右则）修筑一条长约3000米、宽约1米的战壕，并筑起城堡。立于城堡，可鸟瞰柳江、洛清江来往船只。另一路架设2条越过洛清江的大铁链，即锁江链。两条铁链分别长350米，由1458个铁环相扣而成，每个铁环直径为24厘米，重约1.1公斤，皆为生铁所铸。锁江链用于防止沿江而下的清军船队。在敌船未来之时，铁链沉于水底，船舶照常通航；一旦敌船顺江而下，距铁链10多米时，突然将铁链拉到离水面1—2米高度，阻挡敌船前进，亦可致使敌船相撞，遭受极大的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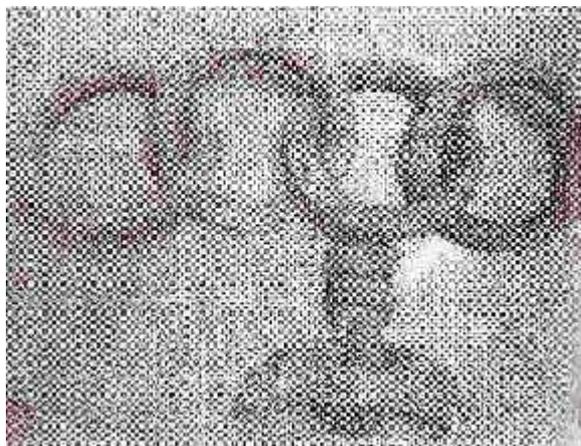
为安全起见，李文茂又派出爱将廖鸣盛率领人马驻扎在第一线——三里寨（今黄冕乡三里寨，为桂林经水路南下柳州的必经之道）。在短短的1个月时间里，便修起一处长约2公里，宽1.7米，高3.4米的石围墙。石围墙筑有射击垛口，墙内设有点将台，因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加之地处江边，成了打击清军的要塞。李文茂前来视察，极为满意。

咸丰七年（1857年），大批清军沿洛清江而下，途经三里寨。除乎李文茂意料的是，廖鸣盛所部与清军激战数日后，终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全军弃寨溃逃。清军初战告捷，不日又占据洛容县城。清军在雒容大力征、造船只，准备攻占柳州。清军首领蒋益澧老谋深算，得知李文茂在江口驻扎重兵，布下锁江链后，即兵分两路，进攻柳州。令北路清军抬船改道，从陆路进发，绕过重兵设防的洛清江口与河道弯曲的三门江水域，步行至洛埠才放船下江；

南路清军则乘船由洛清江水路挺进。两路清军成水陆夹击之势，合围柳州。当南路清军抵达江口时，即遭李文茂守军（守军将领李文辉，李文茂弟弟，外号铁拐李）的迎头痛击。虽然锁江链能阻挡清军一时，但在清军船队连续的撞击之下，也断沉于江底了。

坐镇柳州的李文茂得知清军改道的消息后，一边派兵加强城北防守，一边急令李文辉撤兵江口，增援柳州。然而，在清军船坚利炮的攻击下，如巨石压卵之势，大成国军队终是抵挡不住，败离柳州城。在移师贵州途中，李文茂病逝于怀远。

李文茂创建的大成国虽说以失败而告终，但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与清军殊死搏斗的史迹，在老百姓中世代流传。至今，当地民众还传唱着这样一首民谣：“广东有个李文茂，咸丰七年到柳州；人马扎在清江口，打得清军屁尿流。”



图为大成国锁江链残骸。分别收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鹿寨县文物管理所。

◆ 峥嵘岁月 ◆

从湘潭到鹿寨

●张丽华

1949年秋，我的家乡湖南湘潭和平解放了。在毛主席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庄严宣告声中，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祖国南疆挺进。经湖南省委同意，南下部队决定在湘潭、衡阳、邵阳三市招收一批青年学生，组建广西柳州地区干校，随军进驻广西柳州地区，接管新区工作。

1949年10月20日，是我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正在湘潭中学念初中二年级的我，和学校的80多位同学报名参加干校，投身革命洪流。当时，同学们中间传唱着这样一首歌：“我

们大家手牵手，我们彼此肩靠肩，没有恐惧更没有留恋，一心一意到广西……”

参加干校的学员们在湘潭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学习了革命纪律，革命理论，如《大众哲学》、《为人民服务》等等。11月17日晚上，全体学员和南下工作团的同志在湘潭市礼堂开了个南征誓师大会。干校领导指定我代表全体学员在大会上讲话，汇报了我们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并表示了决心。第二天清晨，我们迎着初冬的朝阳，满怀革命豪情，带着对家中亲人、家乡父老、母校师友的无限眷恋，告别了湘潭。

到达衡阳时，衡宝战役刚刚结束，敌军溃败南逃，整个城市到处破烂不堪。我们在这里迎来了邵阳、衡阳的战友，整个州地区干校的300多学员会师了。由于湘桂铁路遭受敌人破坏，不少铁路桥梁被炸毁，我们在衡阳逗留了几天。干校“见缝插针”就地安排学习，听报告上大课。11月23日，全体学员乘上卡车，向广西进发。11月25日，抵达广西全州县城。稍住三天，又乘卡车经界首、兴安、大榕江、桂林、两江、永福、鹿寨、雒容等县镇，12月17日，终于完成了1000多公里的南征行程，到达了目的地柳州市。

我们刚进入柳州市时，只见街上行人很少，许多店铺关门闭户，这个号称桂中最大的商埠城市一片萧条、破败。干校的女同志住在柳高校舍，该校学生尚未复课。一路风尘，一路汗水，有些人的身上、头发里长了虱子，大家开玩笑说：“我们身上长的是‘革命虫’！”当天，我们总算洗了个痛痛快快的热水澡，消除疲劳，一身轻松！

到达柳州之日，也就是我们从柳州干校毕业之时。12月下旬，干校领导宣布学员分配名单。我被分配到榴江县（今鹿寨县），同行的有18位战友，其中有3位女的——除我之外，还有冯皎兰、岳素。报到后，我分到中共榴江县委，负责党内外文件的收发保管工作。县委书记王应常同志给我安排工作时说：“做这项工作要政治可靠，忠诚老实，艰苦朴素，踏实肯干……”这是我第一次接受革命工作。当时我既不是团员，更非党员，文化水平也不高，我知道这是领导对我极大的信任。

中共榴江县委机关设在原榴江县伪政府地址内，县委只有5个人，县委书记李云亭、组织部长曹建勋，都是北方老解放区南下的老干部，秘书王应常是南工团的南下大学生，另外就是李书记的警卫员和我。我把他们当作尊敬的父兄辈。虽说一个县委就这么5个人，但大家都非常亲切友好，新老团结，上下级配合，新区的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1950年元旦，我们怀着胜利的喜悦，迎来南征后的第一个新年。可是敌人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暗地里散布谣言，蛊惑群众，秘密纠集武装力量搞暴动，残杀乡村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妄图颠覆我新生的红色政权。当时榴江县委所处的形势十分危险，可以说是处在土匪窝里。桂柳公路沿线经常有土匪出没，拦车抢劫、杀人之事时有发生。毗邻的修仁、金秀、象州等县，也匪乱四起。李书记在新会上讲话，号召广大干部群众提高警惕，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剿灭土匪的斗争。广西省委、柳州地委不断发来有关剿匪的通报、指示文件，这些文件都是急密文件，不论什么时候送到县委，我都要及时转发，或由县武装大队负责送到各区、乡去。

一天傍晚，我送完文件回到县委机关，王应常秘书告诉我：“今天下午土匪已经活动到镇外，形势很危急。我们正担心你呢，正要派人找你。”又说，李书记亲自到柳州请求解放军支援，看来部队要到天黑以后才能赶到，叮嘱我行动要多加小心。我和县委机关的同志警惕地值班，直到下半夜，李书记带了一个连的兵力赶回镇里，情势才暂时安定下来。

1950年3月，广西省委批准榴江、雒容、中渡三县合并，成立鹿寨县，县城设在鹿寨镇。从此至1952年间，征粮、剿匪、退租退押、小乡政权建设、土地改革与复查等工作次第展开，期间我一面做着机关工作，一面用大量时间和主要精力深入街道、农村，从事宣传，发动群众，同时也作些调查研究工作。

1951年初夏，县委派我带领一个工作队去黄冕区协助乡政权的建设。当时，剿匪刚刚结束，股匪虽已消灭，但还有零星散匪流窜。匪乱时，农会干部多人被惨杀的阴影还笼罩在群众心里。我们以桐木乡为中心，进行小乡镇的组建工作。我选择并搬进一户姓吴的农民家中，

主人见我到来，推说妻子有病，要我去找别人家住。我跨进他妻子房间一看，这位妇女正患妇科大流血，污血流了一地。我急忙放下挎包，帮她烧热水清洗，打扫房间卫生。一边做些家务，一边与男主人商量，请医生为她治病。他夫妻俩对我非常感激，由此产生了信任。在他们的积极支持和带动下，我们队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了。小乡政府成立前夕，女主人高兴地同我们一道做国旗，扎红花。

也是这一年秋天，我参加思贤乡的土改试点，住在岭背村土改根子陈 XX 家，我和他家的老奶奶同睡一张床。这是他们家最好的一张床，其实也只是稻草铺得厚点，被子没那么破烂罢了。白天三同，晚上开会，我往往半夜才回家，洗了脚，叫一声奶奶，就往床上的破棉被里一钻，紧握着老人身旁一下子就睡着了。一次深夜回来，我叫了声奶奶，没听到回应，满以为她睡熟了，也就不再惊动她。第二天起床，老奶奶还没有醒，我就帮着屋主人烧火、煮粥。直到吃早餐的时候，奶奶的女儿去叫她起床洗脸吃粥，一直叫她不醒，伸手一摸，老人身上已经冰凉，早已停止了呼吸！全家人都哭喊起来，我也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对我的关爱，忘不了她慈祥的笑容……

1952 年春，我带着一个调查组到龙田乡做典型调查，住在林运德家。龙田乡的典型调查是广西省政府布置的任务，全广西共有 12 个要调查的典型乡。调查内容复杂，有政治、经济、阶级、民族等许多项目。组里的同志有：韦绍元、潘忠林、丁巨实、刘 XX 和从桂林卫校来参加土改的两位女学员。我们日夜深入群众，召开各种调查会，收集整理分析研究了大量的资料，按时完成了任务，受到县委的表扬。住在龙田乡期间，林运德的妈妈林伯娘对我十分关心，吃的睡的都照顾周到，像母亲对待亲生女儿一样。说来有趣，邻近的角塘村林伯娘见我勤劳，尊敬老人，托一位廖大娘向我提亲。我只能用土改时期不准谈恋爱为理由，婉言谢绝了。后来，调查任务完成，我回到县委机关，每逢林伯娘来鹿寨卖柴草，总要来看看我。（1987 年 5 月，我和许多老同志应邀回鹿寨参加剿匪土改史料座谈会时，我和老伴王应常一起，在林运德夫妇的陪同下，专门上山为林伯娘扫墓。青草满山，暖风阵阵，经过几十年风雨沧桑的我们，对龙田乡的人民群众，对林伯娘的恩情，无限怀念。）

经受两年多剿匪、土改斗争风雨的洗礼，我经受了革命的考验，在县委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帮助下，我要求加入党组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1952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认真地向县委写了一封申请加入党组织的信，第二天一早就交给了李书记，然后打起背包下乡去了。几天后，我在中渡区石墨乡收到他从新村送来的亲笔信（这封信我至今还珍藏着）。信是写在一张薄薄的打印纸上的，还盖了他的私章。信是这样写的：

张丽华同志：

县委接到你的来信，看到你要求进步的迫切，要求参加党的决心及坚决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意志，我非常高兴。愿你继续进步，发扬自己的优点，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已准备向党提出吸收你参加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愿意作你的入党介绍人。请你积极工作吧！待我们共同回县委时，再和你面谈，祝你很快能作一个共产党员。并祝身体健康。

此致

敬礼

李云亭

1952 年 6 月 16 日

这年的 7 月 25 日，在县委机关支部大会上，由县委书记李云亭同志、团县委书记肖一言同志介绍，经支部大会通过，中共鹿寨县委批准，我加入了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7 月 31 日，在全县总结土改胜利庆功会上，我终于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起右手宣誓入党了！同时，县委还在会上宣布了对我提级、提职、记功的决定。同志们都向我祝贺，说我是“四喜临门”。

黄冕剿匪的日日夜夜

●王应常遗作

奔赴黄冕 准备战斗

1950年3月下旬，县委调我去黄冕区担任工书记、副区长（三个月后升区长）兼黄冕乡乡长。

黄冕距离鹿寨60华里，3月前南下途中，我曾在那儿的旧乡政府内住过一宿。2月底3月初，还写过两篇黄冕区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和减租退押斗争的稿件，发在《广西日报》头版头条。刚调回县的黄冕乡乡长陈立亨同志给我介绍过这里的情况。全区东南与龙江接壤，西南与镇江乡相邻，北接北寿。湘桂路自波寨入境，经大端、黄冕、幽兰三站，直下新村、鹿寨，将辖区土地剖为东西两半。洛清江依傍铁路线，自北蜿蜒向南，直向下游鹿寨、雒容流去，汇入柳江。区政府设在江西岸的黄冕镇，辖黄冕、永安两乡。黄冕乡有慎言、慎业、慎恭、慎思、慎敏、德化6个行政村和黄冕镇的和平、博爱两条街。区政府与黄冕乡政府一起设在原旧乡政府所在的一座破旧的五通庙内，前临和平街，背靠洛清江。全区地势除江岸有些小平原外，大部分为丘陵及山地。

短短的火车路，一个小时就到了。黄冕站驻着解放军的一个营部和一个连队。他们的任务是护路，也是支持地方剿匪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径直向驻军营部走去。营长和教导员见我这样一个戴着眼镜，穿着斜纹布绿色军装，背着背包，挎着手枪的年轻人，客气地让座、倒茶。我简要地说明身份，对部队在这里护路、支持地方工作，代表县、区政府表示感谢和慰问。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情感，使我们初次见面即成了同志、兄弟。接下来几次抽调队伍配合我们入山剿匪，当区政府遭土匪袭击时，他们又及时给予支援。我们亦动员组织铁路沿线村庄的民兵，参加护路，给部队以有力的帮助。

来到区政府，时已近午。同志们都出来和我见面。他们是民政助理陈圣星、财粮助理李皓瞳、副乡长黄奇、工作员梁明通（后来的公安员）、梁彦采（后来的黄冕镇长）、韦彩任（若干年后的鹿寨副县长）、邓岳云等。其中陈李两人是在北平随傅作义起义的青年军事人员，黄奇为本镇人参加过抗日活动，其他都是刚参加工作的。

下午大家给我介绍了区里最近的情况，又和小学校长钟月廷、副校长廖大光、教师李青、商人海永琪等社会上支持我们的人见了面。接着，我便请熟悉这里乡土人情的韦彩任同志带着我，去博爱街尾白家园去找贫雇农兄弟，和他们交朋友。从拉家常开始，谈生活，问生产，感情迅速接近起来。农会主席胡元瑞、民兵黄子茂、黄子秀、吴大贵、伍大苟、许明生、胡海金等十几个人，都在旧社会受苦很深，积极靠拢党和人民政府，切盼真正翻身。但一些人眼见地主恶霸势力尚存，土匪的造谣威胁犹在，彷徨忧虑，正不知如何办才好。从到黄冕的那天傍晚起，我便与彩任同志一道，一家一家走访谈心，又把大家请到胡元瑞家一起商量翻身大计，被称为黄八哥的黄子茂，是民兵队长。他胆大气粗，首先发言：“我是不怕死的，但我们白家园孤零零的隔在街外，连一杆枪也没有，不是等着土匪来割头吗？政府发不发枪？有了枪，我们就敢大胆干！”民兵们齐声赞同，说是手里有了枪杆子，才硬得起腰杆子。我说：

“这枪杆子从哪里来？解放军的枪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弄到枪支呢？比如说，这里的地主商人有没有枪支？你们对这个是很清楚的。”话没说完，他们就嚷开了：“地主商人的枪可以要吗？”我说：“怎么不可以呢？地主的土地财产，土改时都要没收过来分给你们，枪支为什么不可以要呢？地主的枪可以收缴，商人的枪可以先打借条。先把他们的武器拿过来，一可以武装我们，二免得他们拿去支援土匪。地主没有枪，也就没有那么威风了！”

几天后，黄子茂带着民兵兄弟，逐家收缴了张大狗、张小狗、游氏两兄弟及白某某等几家地主、商人的枪支，武装了自己。在收枪中，他们跟地主撕破了脸皮，面对面地斗争，斗志昂扬，态度坚决。后来，我又从县里要来一挺机枪，加强他们的火力，由身强力壮的吴大贵作机枪手。在土匪暴乱后的400多天的艰苦剿匪斗争中，这支民兵始终同我们战斗在一起。和平街的民兵亦以博爱街的民兵为榜样，收缴了这条街的地主枪支。我打电话向李云亭政委汇报这一情况，他对此十分肯定。次日，我即赶往慎恭村的大端河屯，同在那里的梁明通、邓岳云两同志商量，发动那里的民兵收缴枪支。但是，枪支还远远没有收完，全县范围的土匪暴乱即发生了！

土匪暴乱 艰苦斗争

3月底到4月初，土匪在全县暴乱，到处破坏农会，攻打区乡政府，残杀农会干部及我工作队干部。我武装力量薄弱的几个乡政府被迫撤到寨沙、鹿寨镇。全县有三分之二的农村一时为土匪控制。成份原本不纯的县大队，有部份人员投奔土匪。没有经过斗争锻炼的农会、民兵组织，大部份瓦解。王廉泉副县长在寨沙到政府旁边百余米的道路上行走，亦被土匪埋上的地雷炸伤。一时间，乌云翻滚，形势严峻。

黄冕的土匪暴乱，以慎言村的农会正副主席梁昌远、巫剑彰被惨杀首开其端。全区农会干部、民兵积极分子一下子被杀害16人，枪支被夺走50多条。各村农会基本瘫痪，有的表面与我应付，暗地与匪通气；有的公开投匪。这些农会干部多半是解放时一哄而起的流氓投机分子，风向一变，他们亦跟着变了。如和平街的农会主席黄友贵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旧社会好吃懒做，嗜赌贪杯，无正当职业。刚解放，非常积极，土匪一暴乱，他就经不住威胁利诱，替土匪造谣惑众。

当时，区干部与博爱、和平两街的民兵，总共只有20多条枪。后来成立的区中队，亦不过30多人。而时常威胁骚扰广大农村的廖中立部和潘海金、潘彩荣部两股土匪，即达400余人。幸好黄冕、幽兰车站驻有护路部队，区乡政府的安全才得到一些保障。面对严峻形势，我和大家想出了三条对策：一是开展宣传，稳定人心。出黑板报、张贴报纸、召开群众大会，针对土匪谣言，进行驳斥。二是狠抓情报，通过各种社会力量，依靠农民积极分子，特别是受害农民家属，了解匪情，争取部队进剿，打开沉闷局面。4至7月初，我们先后对活动于桐木、田寮、里定、古赏、金盆、古云等村及永安乡政府西面某处之土匪，主动进击多次。由于土匪耳目较多，我们扑空多捕获少，但亦给敌人造成威胁。三是构筑防御工事，发动街民在两个炮楼处的街口及通向中渡的街口修建栅门。白天开放，晚上封闭，整夜站岗放哨。干部、民兵混合编组，小学教师李青等亦参加了这场自我保卫的斗争。我与陈圣星、黄奇等分工查哨，鼓舞士气。这种闭门防守，在匪乱初期，对稳定人心，有些作用。但它是被动消极的，敌人则趁机夜间在外围大胆活动，以致西面两三里外的桐木村、对河火车站旁边的山脚村，不时有土匪窜来。后来我们变消极防守为积极进攻，被动局面才逐步打破。

4、5月间，正值春耕时节，农民不敢去街外耕作。我们及时组织了武装变工队，动员农民换工互助，用武装掩护生产，保卫春耕。除留梁彦彩看守机关外，我同区工作人员都到田间地里和群众一起劳动。枪支架在田边地角，轮值一两人放哨，有匪警即拿起武器作战。开始在镇的附近进行，后来扩展到8里、10里外的大马村、三里屯、矮山村等地，帮助被害农民家属抢插水稻。慎言村田寮屯被匪杀害的农会正副主席的妻子梁大嫂、巫大嫂家的田，一

直未犁耙耕种，回村的恶霸土匪头子韦思俊、韦治泰威胁群众，不准帮她两家插田。我得知情况，立即同铁路驻军联系，争取到一个连，配合武工队，于5月25日凌晨奔袭20里外的田寮。韦匪熟悉地形，乘黑夜逃走了。我们和部队的指战员及当地的一些村民，将两家丢荒的田速犁速耙，边耙边插秧。后来，以区政府和农会的名义，给部队送了一面锦旗。

抗美援朝战争暴发，匪特活动再次猖獗。五通庙防守条件差，我们将政府暂时搬到地主张仲衡的空宅内。这时，李云亭政委给我指出：要进一步改变夜间单纯在内防守方式，采取内部防守与外围加强活动相结合的方法，积极扩大影响，同土匪争群众，争地盘，把敌人从江两岸、铁路两侧附近的村庄逐步挤出去。我立即同区中队长黄陀、民兵队长黄子茂及黄奇、陈圣星、李皓瞳等同志商量，组成两支人马，一支留守黄冕，照样放哨站岗；一支乘夜机动出击，不定时，不定向，或黄昏进村，半夜又走，或半夜进村，黎明即出，或躺在铁路边，或借住群众家，或召集群众作宣传，或突袭匪首的家。这样，悄然到来，悄然离去，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动向。这一着果然有效，我们的活动天地逐渐扩大，敌人的骚扰区逐渐缩小。当时的这种主动出击，还是防御性质的，以进攻求防御，争取时间，等待大部队剿匪时机的到来。

初秋，我们侦知东北部的瑶山有廖中立股匪在活动，县里出动了4个连兵力，星夜赶到黄冕车站，由我带着武工队和民兵配合进山。瑶山山高密林，村落稀疏僻远。入山后遇到连天秋雨，我们的衣服都湿了，满身泥水。由于敌人在黄冕藏有暗探，我们在瑶山多处奔袭，连续3天竟无多大收获。西岸的敌人却趁区政府空虚，乘夜打进了黄冕镇。精干的民兵都随部队进山了，博爱街炮楼由许明生、伍大苟两个民兵守着。土匪在炮楼下喊话：“王区长都被我们抓住了，你们赶快投降吧！”一边喊话，一面装扮着殴打“王区长”的声音。两个民兵听了好笑：“王区长带了大部队进山，土匪怎么会在这里抓到他？呸！骗我们的！”他俩连打两枪，拒绝了敌人的诈骗。包围和平街的土匪，也向炮楼胡乱打枪。刚分配来黄冕的河南人王邦治，正同另一个民兵守着这个炮楼。他是个有经验的枪手，从炮楼枪眼向楼下打了一枪，便听到“哎哟”一声，一个土匪倒了下来。这时，车站的部队听到枪声，知道发生了匪情，立即吹起了冲锋号，连打了几发迫击炮弹。乌合之众的土匪以为解放军打过来了，抬着受伤的土匪，一溜烟跑了。

从瑶山回来，我们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决心消灭土匪的暗探特务。不久即抓获了一个暗藏在镇上专门向土匪送情报的敌人，报县批准，经人民法院公审枪决。又一次，我同公安局长高继升配合部队在古云、半山剿匪。在半山的一间破屋里，土匪廖中立正和几个匪徒煮饭吃，发现我们，慌忙边打枪边逃跑。民兵人太少，大部队还在后头，让他们溜掉了。民兵们正在懊恼，忽见通向山脚道路的拐弯处闪出一个人来，头戴斗笠，挑着两大箩米，吃力地向山上走。这人猛抬头，看到剿匪部队，惊慌失色，转身就想下山。民兵把他拦过来问话，他吱吱唔唔，不肯实说。民兵一搜，在米箩里找到一封廖中立派他去卜月村筹粮的信。原来这家伙是匪部军需主任，刚强要了老百姓的粮食挑上山，就被我们活捉了。

镇压了匪特，活捉了匪军需主任，大大振奋了干部、民兵的斗志，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从1950年4月到12月，我们配合部队主动奔袭敌人10多次。

剿匪胜利 告别黄冕

1950年11月10日，毛主席电示广西省委，限在1951年5月1日前消灭全省股匪。我们抓住解放大军于1951年元月初重点进剿大小股匪的有利形势，开展宣传攻势，抓紧清匪反霸。经人民政府批准，组织人民法院，公审和处决已被我捕获的罪大恶极之匪霸、惯匪。第一次公审大会在黄冕小学广场举行，公审杀害慎言村农会正副主席的韦匪思俊、杀害三里屯农会干部的陈匪亚有等。公审前，先设灵公祭全区被土匪杀害的农会干部及民兵，将准备公审的罪犯押跪灵前。我担任主祭，泣读祭文，表示决心彻底肃清土匪，为死者报仇，为生者求翻身。接着开庭公审，苦主的悲声泣诉，引起全场一片哭声，民兵不断发出要求枪毙罪犯

的吼声。我作为庭长，代表法庭宣判，予以枪决。匪霸低头伏法，群众欢声震天。会后，全区清匪反霸形势迅猛发展。

2月底，我大军进剿大小瑶山的战役胜利结束，残匪、惯匪纷纷逃往黄冕以西的中渡、百寿、柳城、融安交界处的四十八弄，与盘踞在那里的匪桂中军政区司令何次山、副司令向天雷等股匪汇合。四十八弄是广西土匪的最后一大巢穴。我军在剿灭大小瑶山土匪，捕获林秀山、古少镛等大匪首后，马不停蹄，立即从四面八方扑向四十八弄。黄冕区根据整个战役布署，担负着封锁境内洛清江江面，清剿溃逃残匪，防止其渡江东窜的任务。我将区乡干部及区中队分成两支队伍，一支管面上的清匪、宣传工作；一支负责发动洛清江西岸各村农会、民兵、儿童团封江拦路，设卡放哨。重点放在慎业村的里定、上西游、中西游、下西游一带，所有的竹筏、渔舟、渡船都控制起来，白天晚上严加巡防。

3月下旬，黄冕区迎来了解放军九四五支队工作队20余人，由支队保卫科长吴银慧率领，配合区里，在沿中渡边界上的慎言村上下七八个自然屯，与永安乡的盘龙、百花寨一带，建立起一条更靠近前线的新的封锁线，以堵击、捕捉自西部几处山口东窜之匪。指挥部设在改江村，并迅速把电话线从黄冕拉到改江。群众的斗争热情高涨，报告匪情的人不断来到指挥部。一批批匪俘被押往黄冕、鹿寨；一支支缴获的钢枪，加强了民兵的火力。惯匪、匪霸，由县委迅速批准，就地组织人民法庭公审枪决。但一些凶恶的顽匪尽管日暮途穷，仍然负隅顽抗，清剿中还不时要付出代价。一天夜里，百花寨民兵来报告，该村逃回一个叫韦中权的土匪团长，半夜进村讨饭吃。此人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过校级军官，很会打枪。我们立即带队赶去，将他包围在一片油茶林中，喊话促降。此夜月色朦胧，敌从暗处窥我甚明，我们向茶山望去却迷朦不清。当喊话无效，我部队两个战士见茶林某处突然摇动，急着端枪冲进去时，先后被韦匪开枪击中，一位负伤，一位牺牲。韦匪利用他谙熟的地形，逃脱了。不久，他走投无路，才带着我军散发的自首投降从宽处理的布告，向我自首。人们恨得咬牙切齿，想立即枪毙他。但我们的政策还是保护了他，竟得免于枪决。另一土匪副师长潘彩荣，亦曾任国民党的上校团长，此时从四十八弄昼伏夜窜，回到慎言村家里。饥饿疲劳，抵抗不及，一下子就被村上民兵捉来指挥部报功。

四十八弄的剿匪战役，在4月下旬胜利结束。九四五支队工作队即将离开黄冕归队。我第一次在五通庙内区政府大厅（这时区政府已迁回这里办公），为他们及区中队、区干部、民兵骨干庆功，亦为他们饯别。县委组织部长曹建勋专程自鹿寨赶来，代表县领导向他们祝贺。

重点剿匪工作胜利结束以后，全区工作立即转入一面继续清匪反霸，一面整顿农会、民兵，加速小乡政权建设方面来。

一天，接县里通知，上级人民法院已批准，将黄冕区抓到的大匪首潘彩荣公审枪决。公安局将潘匪押到区后，单独关在大厅木囚笼内。负责看守的区中队战士就睡在木笼上面的楼板上。在公审前的一天晚上，潘匪竟带着脚镣，弄坏木笼，打开区政府后面通向河边的门户逃跑了！我即动员全区群众又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搜山清匪，连妇女儿童都出动了。估计潘匪逃走不会太远，我们把搜查重点放在洛清江两岸距离区政府不远的地区。一时，漫山遍野，到处是红旗，到处是喊声。下午5点，大马村民兵飞跑着来报告喜讯——他们村里一个割草的妇女在草丛中发现了潘匪。潘匪没有挣脱脚镣，肚内又饥饿难忍，正躺在草丛中想等天黑再逃。他向那位妇女求情告饶，那妇女却高声呼叫附近的民兵，将他再次捉拿归案。

当晚在圩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我盛赞全区人民的积极勇敢和热情，认真检讨了自己的工作失误。说到恳切处，忍不住落下泪来。开完会，我又打电话向县领导汇报了当天发生的事件，请求给予处分。接着连夜写了一篇自我批评的稿件，投给《广西日报》，希望别的地方引为鉴戒。这是我第一次写批评稿，也是第一次作公开的自我批评。

初夏的一个上午，县里派来了一个由张丽华同志率领的武工队，协助我们开展小乡政权建设工作。6月下旬，武工队胜利结束了桐木、岭头两个小乡的政权建设，返回了鹿寨。一份调我回县委工作的通知也即送到了黄冕。我在这里与群众同甘共苦，一起战斗了460多天，

情感甚深。消息一传出，群众即酝酿要为我设宴饯行，并要欢送我到火车站乘车。我决定不兴师动众，不坐火车，而是悄悄坐船从水路回县。刚好前一天我已安排梁明通同志雇了一条木船，要将剿匪中缴获的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装好，准备运回县。这船就靠在区政府后屋下的挑水码头。于是我一大早就同梁明通同志及两个民兵下了船，依旧穿着一年前来时那套旧军装，背着一年前来时的旧背包，向区里的几位同志叮嘱握别，随即解缆南下。

别了，为你辛勤战斗了400多天的黄冕！别了，长期同风雨、其酸甜的战友同志！我站在船头，心潮澎湃。当初，土匪曾悬赏30担谷子买我的人头，而今，我却在剿匪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看到的却是土匪的灭亡，人民政权的巩固壮大！

难逃法网

——残匪王启章沈振儒沈子高覆灭记

●徐运武 林润德 秦肇基 韦高平口述

●路 德整理

1951年5月，鹿寨境内的剿匪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猖狂一时的匪患已被剿灭，重大匪首无一逃脱灭亡的下场。可是，一些残存的土匪小头目如漏网之鱼，依然潜藏，有待肃清。

关德超匪部被我人民解放军在象州县大乐围歼后，匪团长关德超（伪雒容县大龙乡乡长）被打伤后，东躲西藏，下落不明。副团长王启章（伪大龙乡副乡长）、沈振儒（伪鹿寨镇镇长）、沈子高（匪副官）三人，即潜回鹿寨藏匿。他们先在距离县城数里之遥的茉莉村潘岩躲藏，后来，为了便于家人送吃的、用的，又转移到龙田村桃家坪王启章的畲基边、十里亭芭芒塘沈子高的畲地旁挖洞藏匿。过了一段时间，又认为离家太近，在自己的畲地挖洞，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又转移到离家不远，但却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在波井村附近的铁路桥头宿马沟岭边挖洞藏身。他们利用情报员王老七（惯匪，浑名“水老虎”）替他们探听消息和传递物资。王老七是船民，长年不分昼夜沿河捕鱼，四处游宿，所以长期与藏匪来往，竟没被人怀疑和发现。

1952年春节后，王启章他们晓得我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蒋介石反攻大陆已成泡影，觉得继续这样藏匿下去，迟早要被人发现，同时经济和身体健康状况也难以维持，就打算逃到外乡去闯荡，伺机另找出路。他们也懂得没有政府部门特别是公安局的证明，不论逃到哪里都难扎稳脚跟，随时都有挨抓的危险。经商量后，由王老七去柳州刻制鹿寨县公安局的假公章。于是，王老七赶到柳州，找人刻章。这位刻章师傅，见王老七没有按刻公章的规定持有鹿寨县人民政府的证明，就故意问他要刻的公章直径是多少公分？王老七吱吱唔唔，答不出来，就讲“按你们以往刻的规格就得了”，急忙付款，问了取章的日期就溜了。王老七的言行引起了刻章师傅的怀疑，就向柳州市公安局举报。市公安局与鹿寨县公安局电话联系后，决定等王老七来取公章时将他抓住，交给县公安局查处。

王老七被拘押到鹿寨后，态度很不老实，只承认私刻公章是为了自己做投机生意时写证

明用的。半年时间过去了，他仍然不肯交待王启章一伙匪徒藏匿的情况。

再说，藏在洞中的三个匪徒见王老七到柳州取公章久不归来，一个个心急如焚，就让送来食物的亲戚去打探情况，亲戚也不知王老七的下落。这一下，他们判定王老七出事了。三人一商量，觉得这里已不安全，不是久留之地，决定冒险离开这里，到新村车站爬火车外逃。

在一个月色朦胧，寒风呼呼的深夜，王启章三人像老鼠一样钻出洞口，趁着夜色沿铁路边的小道走去，刚爬上路基，就被我守桥部队的岗哨发现了。哨兵一声大喊：“干什么的？站住！”他们不敢答应，急忙滚下路基逃跑。哨兵立刻朝他们开枪射击，弹头从他们身边飞过，差点要了他们的狗命。三个人又缩回洞中藏身，成了洞里的老鼠，惶惶不可终日。

凑巧得很，几天后，冷水冲沈子高田边的稻草堆被牛掀开半边，看牛的人发现稻草堆中藏有大米、花生、猪肉、衣物，赶紧回村向治保主任报告。村干部认为，这些东西也许与下落不明的沈子高几个匪徒有关，又马上向公安局报案。公安人员察看现场后，连夜提审王老七，追问他沈子高躲藏的地方。经过一番政策攻心，王老七以为公安局掌握了藏匪的线索，终于承认了他替王启章他们到柳州私刻公章，与他们有过联络，表示愿意立功赎罪，争取从宽处理，答应带部队去捉拿藏匪归案。

参加这次捉拿藏匪行动的，有公安、驻军、县大队的干部和战士，还有交通街的部分民兵。天快亮时，大家冒着寒风冷雨，撒开了罗网。由于王老七已被关押了半年之久，藏匪躲在哪个洞里说不清楚，藏匪的家属也不肯说实话，只得将几个洞穴逐个搜查。首先到茉莉村的潘岩搜捕，再到桃家坪和芭芒塘洞穴搜捕，结果都扑了空。眼看已到下午 2 点多钟了，大家忍着寒冷和饥饿，向司马沟最后一个洞穴进发。

来到司马沟，只见洞口用草皮泥封塞着，可以料定这就是残匪藏身的洞穴。立刻，搜查的队伍按事前的分工，包围封锁了现场。接着，开始向匪徒们喊话：“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缴械投降可以从宽处理，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可是，洞里没有动静。指挥员让王老七到洞口劝降。王老七在洞口边劝说边搬开草皮泥，洞里的匪徒认为王老七出卖了他们，骂他是“叛徒”，向他开枪，子弹打中了王老七的大腿，鲜血直流。指挥员派人扶王老七撤下，送往医院治疗，改由藏匪家属去劝说。趁沈子高的老婆与洞里的人对话时，派人迅速扒开洞口的部分草皮泥。沈子高不但不投降，还要他老婆赶快离开，说“我们又要开枪了，子弹是不长眼睛的”。

见这伙匪徒顽抗到底，指挥员决定硬攻。一声令下，机枪、步枪、冲锋枪向洞口猛烈开火，洞里的匪徒也向洞外还击。双方对峙了好一阵，指挥员命令机枪掩护，派战士从洞口两侧向洞中扔了几个手榴弹，随着几声“轰隆”巨响，炸塌了部分洞顶，匪徒们停止了射击。随后，指挥员又派匪属进洞劝降。不多时，匪属从洞里抹着眼泪出来了，说是他们三个就是不肯出来投降。

这时，已是下午 6 点钟了。指挥员再次命令向洞里猛烈射击，掩护战士到洞口向深处左侧壕沟拐弯处扔手榴弹。又是几声巨响之后，洞里传出了“哎唷哎唷”的惨叫声。指挥员再让匪属进洞，问匪徒是不是愿缴枪投降？匪属进洞后，很快就出来报告：沈振儒头部被弹片炸穿了洞，死了；沈子高脸上和胸部血流不止，王启章手脚被炸断，两人也快死了。

匪徒们的亲属进洞，将三个死伤的家伙抬出洞口。民兵们用牛车将他们拉回了县城，第二天摆在广场（今县小宿舍楼处）示众三日，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连他们的一些亲属也骂他们是“该死的東西”！

正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三个残匪最终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顺带讲一句：这次战斗结束后，在清查匪穴时，缴获了卡宾枪、快慢机驳壳枪各一支。子弹数十发，还有一把东洋长刀。

雾中擒匪

●莫杰

1950年秋，中渡县大队一连一排在排长赵恩常的率领下，奉命进驻中渡区长盛村，配合中渡区区长何韬率领的武装工作队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工作。当时，我是一连一排的一员。

长盛坳是鹿寨至中渡的必经之路，是中渡、雒容、榴江三县的结合部，地势险要。解放前，土匪常在这里出没，抢劫、毒打过往商旅和走亲访友的百姓。群众极度恐慌，不是生活所破，无人愿过这长盛坳。我们排进驻长盛村后，土匪仍气焰嚣张，不时在长盛坳抢劫。可是，我们几次出击，都扑了个空。

为找出相应对策，我们召开了军事民主会议。大家认识到，近半个月来，大家有急躁、轻敌情绪，把复杂的剿匪斗争看得简单化了，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只有深入发动群众，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才能夺取剿匪斗争的胜利。

会后，全排干部战士和工作队立即深入各村屯，帮群众挑水、劈柴、干农活，同时宣传政府的清匪反霸、减租减息政策和决心。慢慢的，群众把工作队和解放军当作亲人，纷纷开始揭发匪情，实际上，长盛坳的土匪抢劫，是长盛村果落屯的陈日贵勾结附近的地痞流氓所为，陈日贵此人平日勾结地主恶霸，欺压百姓，作恶多端，以吃喝嫖赌为乐，群众敢怒不敢言。武工队及县大队一来，他走投无路，只好躲进山洞、丛林。于是，我们进一步采取措施：第一、大力宣传“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政策，分化瓦解土匪。第二、直接找土匪家属、亲戚朋友做劝降工作。第三、监控土匪可能往来的地方，堵死土匪筹粮筹钱的路。

一天，群众向何区长报告：匪首陈日贵当晚要到距长盛村10华里的雒容县大桥屯筹粮。何区长和部队首长分析，由于我们在这一带发动了群众，断了土匪的粮源，这情报是可信的，决定抓住战机，当晚出击。

午夜时分，队伍出发了，拂晓前将大桥屯团团围住。但天亮后，我们搜遍全村，也不见陈日贵的踪影。早晨的雾气很大，百米开外已看不见东西，陈匪会不会趁茫茫大雾，溜出了村子？首长即命部队，把搜索范围扩大到村外的山洞丛林，决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

不久，正在村外搜索的战士突然发现，山冲里隐隐约约地走出一个戴斗笠大雨帽的人。这人嘴里嚼着牛甘果，一副饥饿的样子，相当可疑。战士们立即悄悄的围上去，当他看清我们的时候，已被我们围住，无法逃跑了。刚开始，他看见包围他的是解放军，就巧辩说是本地群众，想蒙混过关，谁知，何区长也在场，一眼就把他认出，他正是我们要抓的匪首陈日贵。

我们对他搜身，发现他身上有不少的牛甘果，嘴里也在不停的嚼着充饥。我问他：“你饿了吗？”他边嚼着牛甘果边回答：“这种果好吃，先苦后甜呢！”我说“过几天才给你甜呢！”在押他回长盛的路上，他老婆带着他十来岁的儿子，正好与我们相遇，我们对他老婆说：“叫你劝陈日贵回来，不做土匪，可以从轻处理，你不来劝，现在晚了，已经把他抓住了。”他老婆沮丧地低下了头，无话可说。

长盛坳的雾气渐渐消散了，我们把陈匪押回长盛村，随即转送中渡县公安局。经审讯，陈日贵确实罪大恶极，不几天，就在中渡街头的广场被镇压了。其余的协从土匪纷纷来自首，至此，长盛坳太平了，恢复了往日的交通。

夜半枪声驱土匪

●谢永宁

1950年隆冬腊月的一个夜晚，寒风呼啸。距离中渡县一区公所约4里开外的六末村，传来一阵阵狗叫声。我和吴克飞、余贵贤、卢勋，还有小韦几位同志在区公所值班站岗，听那狗叫声越来越猛烈，当即判断，一定是土匪下山，进村抢劫老百姓的财物了！那时，我们都是二十上下的年纪，火气正旺，朝气蓬勃，无所畏惧，不怕牺牲，决定到六末村去看过究竟。

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提着枪，踏着凹凸不平的牛车路向六末村摸索着前进。牛车路的右边，有一条干沟。快到六末村时，我们考虑走大路易被土匪的哨兵发现，就弓着腰，走在干沟里。谁知，走不多远，还是让土匪的哨兵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

“哪个？！”土匪的哨兵拉响枪栓发问。我们立刻伏在沟底。土匪没听到回答，就向我们开枪了。子弹从我的头上飞过，好险！我们朝土匪开枪的方向立刻还击，一阵“乒乒乓乓”的枪响过后，却不见土匪向我们开枪，我们以为土匪被击毙了，可是摸上前一看，却没见土匪的尸体，只听见远处一阵跑叫声：“解放军来了！快撤！快撤呀！”原来，是放哨的土匪跑回六末村报信去了！

土匪们真是乌合之众！他们乱成一团，朝六末村后背即现在的英山铁厂石山半腰里撤退。我们人太少，天也太黑，也就不再追击了。

事后得知，这天晚上，土匪来了100多人，想抢掠六末村群众的粮食、牲口和其它财物，要洗劫六末村。虽说我们没打死打伤土匪，但是赶跑了土匪，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第二天，我们到六末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群众对我们十分感激，他们讲：“昨晚夜呀，要不是你们及时赶来，我们就遭殃了！”

如歌岁月旧履痕

——鹿寨农村工作回忆录

●沈光明

大龙征粮

1950年2月，我和黄尚达、小蒋三人在原雒容县大龙乡金鸡村征粮支前。当时，雒容刚刚解放，乡、村两级人民政权尚未建立。因此，乡、村公务仍由国民党委派的伪乡、村长管理。金鸡村的伪乡长姓孙，30多岁，家住金鸡屯，为人还算老实正派。我们入村后，在他的帮助下，采取大会、小会、个别访问的方式，向村民宣传了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宣传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宣传了征粮的目的以及“粮多多出，粮少少出，无粮不出”的征粮政策。同时，还摸清了各户土地占有和粮食产量等情况，并在依靠贫苦农民的前提下，组成了公粮“评议小组”。然后，经过自报公议，“三评三议三榜”，把全村的公粮任务评定到户，而且立即按“先

大户，后小户”的次序开始送粮入库。

金鸡村开始送粮入库后，我们三人又被派去秀水村征粮。临行时，中共雒容县委组织部部长张金城叮嘱我们：秀水村地处雒容、中渡两县边界，情况复杂，民风骁悍，要我们入村后提高警惕，要与留用的伪村长同吃同住，不要单独行动，不要随便向人透露行踪。我们走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发了一枝七九步枪和 20 发子弹，以防万一。我们谨记张部长的教导，到秀水村后，三人行影不离。在公粮评定到户后，伪村长一再向我们打听“去留”情况，我们都没告诉他。直到送出了第二批公粮，我们才悄无声息地离开秀水，取道东塘村返回了雒容县城。之后，不出半月，大龙乡工作队员欧阳景明、石显德两同志到秀水催粮，竟被秀水村匪首莫秀梅杀害于往返鹿寨镇之半道上。嗣后，莫秀梅被我县大队活捉，并在雒容县城枪决（详见《文史资料》第七辑）。

运江反霸

1950 年秋末，经重点剿匪后，雒容境内之股匪已基本肃清。剿匪工作进入了“清匪反霸”阶段。当时，我还在运江乡（今属象州县）参与公审、处决运江乡最大的匪霸杨省堂、韦善谋。

杨省堂，运江乡新运街人，早年在国民党正规军干过营长，解甲回乡后，横行乡里，无恶不作。1949 年 12 月雒容解放后，他知道末日将至，即与雒容大龙乡二兴村大匪首林秀山勾结，出任匪桂中军政区 126 军第三师师长，纠集匪类 600 多人枪，攻打我运江乡人民政府，杀害我工作队员廖启福、潘子敬两同志，罪大恶极，民愤极大。

韦善谋，40 多岁，运江乡马兰洞人，曾任伪雒容县朝庆乡（今属象州县）乡长。马兰洞乃雒容、象州两县界地，地处偏僻。韦善谋以土皇帝自居，独霸一方，欺男霸女，巧取豪夺，当地百姓畏之如虎，称之为“朝庆王”。1949 年底，雒容县解放之初，县人民政府为了“统战”，曾由县长周春鸣签发委任状，致书韦善谋请其出任县人民政府民政科长。韦不仅不从，反而投靠大匪首林秀山，任匪团长，与人民为敌，还企图杀害我奉命请其出任民政科长的运江乡民兵中队指导员蒋满春、中队长钟有声两同志，亦属罪大恶极。

杨、韦两霸，在重剿中皆为我驻象州县的剿匪部队 437 团捉获，并押回运江公审、处决。参加公审大会的群众在万人以上，我担任司仪。受两霸之害的苦主，争先恐后地上台痛斥两霸罪行，诉至伤心处，竟泣不成声，群情为之愤慨。经验明正身，两霸被当场处决，大快民心！

长塘“双减”

在运江乡的“清匪反霸”后期，我和王贵庭（后调县公安局工作）到长塘村（今属象州县）搞减租减息。当时，长塘村已经成立农会，主席是一位 40 岁上下的中年妇女，名叫蔡玉珍。我和王庭贵住在她家的耳房，也在她家吃饭。长塘村有 40 多户人家。最大的地主叫谢锡九。我们入村之前，谢锡九由于害怕罹上通匪的罪名，早已携全家出逃，不知去向。因此，农会使用他那三间两座两回廊的青砖屋来办公、开会。他遗下的家私和三、四千斤稻谷，亦由农会代管。经农会会员讨论，将其一部分稻谷，由农会按“双减”政策退还给谢的佃户，一部分代交公粮，剩余的充作农会经费。我们在长塘村搞的是“和平”双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夜夜开会，或者开三五户人家的“串联会”，一次又一次地讲共产党的革命宗旨、革命历程，讲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讲全国解放和广西的剿匪形势，提高群众觉悟，以迎接土地改革。

顺便说一句，长塘村是个好地方，村旁有条河，沙坝是一大片肥沃的洲畚。村民多在洲畚种红籽西瓜。我们在长塘村时，正是红瓜子收获的季节，洲畚上天天都有人“踩瓜”。长塘

村的红瓜子，以籽大色红肉厚而驰名，经运江水路远销广州、香港等地。长塘村没有多少水田，村背的黄土坡多是贫瘠的旱地。每年，村里人都用这些坡地种植耐旱的“糝子”。村里的贫苦人家，一年四季以“糝子”为主粮。我们在蔡玉珍家住了半个多月，几乎见天吃的都是“糝子粥”。

七区土改

1951年，雒容、中渡、榴江三县与修仁四排等部分乡村合并成立鹿寨县。1952年元月，我在鹿寨第七区（导江）都莲乡都莲村（今属象州县）参加土地改革。我扎的土改“根子”叫韦世清，是一位40多岁的单身雇农。据他说，他的祖上原也有几块田的，只因1946年打跑日本鬼后，都莲闹饥荒，他父亲借了本村地主韦德辉的高利贷还不起，田就归了韦德辉。他父亲过世后，他一直给韦德辉打长工、短工生活。此时，他家只有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草屋。屋子里，有一张用圆木支撑的芒编床。床上那张破草席下，铺着一层稻草。床头有一个泥巴糊起的小火灶，两只旧木桶、一口小鼎锅、一口小扒锅、三四只粗瓷碗。这些东西，就是他的全部“财产”。我在他家“扎根”后，白天与他同吃辣椒盐送“稀溜子”——见不到米粒的稀粥；晚上和他同睡在那张芒编床上，同盖那张又黑又硬，还穿了几个洞的破棉胎。我和他同吃同住了五、六天，他的阶级觉悟有了提高，串连、诉苦、挖穷根、揭露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罪行，都表现得十分积极。因此，在成立农会时被选为副主席。也是由于这次“扎根”，才使我感受到，在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下，贫苦农民过的竟是如此艰难的生活。

在七区的土改后期，我又被派去佛子乡接替该乡工作队队长练石生的工作。这时，土改已进入斗争、清算、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五大财产”（即土地、耕牛、农具、房屋、浮财）阶段。这个阶段里，七区在导江街召开了一次全区12个乡群众参加的万人大会，并在斗争大会上枪毙了坚持反动立场的江口乡大地主张瑶（女）、都莲乡恶霸地主韦德辉。从而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为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五大财产”，逐步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洛埠复查

1952年春，鹿寨县以六区（雒容）为试点，开始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我被分到洛埠乡（今属柳州市）任工作组副组长，六区副区长蔡菩庵为组长，组员有韦林、潘光岚、吴斌（女）、谢银月（女）等人。

洛埠乡辖区不大，但城乡交汇，半村半街，有商人、工人、街民、农民，成份复杂，而且还是雒容县大官僚恶霸地主何次三的老巢，匪顽势力深远。（何次三于1950年与何宗钊组织反共救国军桂中军政区，自任司令，煽动武装暴乱。1951年4月被我剿匪大军在鹿寨四十八弄地区击毙。）

我们进驻洛埠乡之前，洛埠乡已建立了农民协会、工人协会、商会等组织，委员有龙玉珍（女）、陈登科、吴大嫂（女）、吴发才、何翠屏（女）、张坤生、秦光裕等。何日燊任乡长。

我们在洛埠乡复查的任务是：一查阶级，二查组织，三查觉悟，四查土地分配等等。经过十几天的访贫问苦和大会小会的发动，没有查出错化成份、组织不纯、土地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只是有少数人反映乡长何日燊经济不清，而且没有与地富反坏划清界线。为此，工作组决定撤销其乡长职务，并组织群众对他进行了一次大会批斗。

洛埠乡的土改复查工作结束后，工作组为了使洛埠今后少出问题，经请示县委同意，将工作组员韦林留在洛埠任乡长，潘光岚任洛埠小学校长、谢银月任小学教导主任。土改复查工作在全县铺开时，我仍回七区（江口）任新安乡工作组组长。

六合办组

1953年夏季，我在七区（江口）六合乡办互助组。在此之前，六合乡各村屯都有过“亲帮亲”、“邻帮邻”的临时性互助。但因在互助中，没有解决好劳动力、畜力强弱的互利问题，互助了一阵子就停止了。我了解这个情况后，即以德建村谭绍生互助组为重点，经过组员多次座谈、讨论，决定采用“评工记分，按劳取酬”的方法，解决互助中的强弱互利问题。这个办法在谭绍生互助组实施后，反映良好。“以点带面”，是当时农村工作的基本方法之一。因此，我很快就召开了各村屯的互助组长座谈会，介绍和推广谭绍生互助组的做法和经验。会后枫木村的黄汉民、黄坪村的吴秀英、大井村的梁体彩、德建村的丘达朝等互助组都借鉴谭绍生互助组的做法，恢复了互助。这一年，参加互助组的农户，由于得助于“群力群策”，既能不误农时，又能互相交流、借鉴生产经验，推广良种良法。因此，农作物的收成比未参加互助组者均有增加，从而引导了互助合作化的发展。

趁此，顺便说两件题外事：其一，六合乡田少山多，山地肥沃，村人多垦山种植木薯、大薯，以弥补口粮之不足。大薯的个体常在八、九斤上下，收成极好。我在谭绍生家住了两个多月，一日三餐皆以大薯充饥。其二，六合枫木村有个匪首叫钟华英，手下有匪徒五十多人。解放前，常在柳江横滩抢劫汽船，又在桂柳公路三门江十二湾和雒容了旺村等路段打劫汽车，还在柳州河南抢过金铺。解放后，与林秀山勾结，任林匪126军副军长。重剿时漏网，藏匿于六合的荒山洞中，直至我在六合办互助组时，才被我剿匪大军某“飞行小组”在六合鸡公山发现、击毙。

冲口建社

1954年春，七区（江口）丹竹乡冲口村以叶振权为首，自发组织了农业社。县委知情后，决定作为五个试办社之一。（其它四个试办社为中渡区朝阳村宋家甫社，高椅村陶昌乐社，雒容区半塘村张宗盛社，寨沙区官庄村陈瑞献社。）立即组成工作组进驻冲口积极引导。工作组长为廖孝赞、副组长为肖坤厚、沈光明，组员有杨如德、李媛英、张XX（县农业技术员）等人。工作组入驻冲口约半个月，廖因被提升为城关区委副书记，肖因被提升为平山区区长，同时离开冲口村，工作组由沈任组长。

驻冲口初级农业社工作组的工作主题，概而言之只有六个字，即巩固、提高、发展。细言之，则是一抓思想、组织建设，二抓生产管理，三抓财务管理。因此，工作组一入村，即组织社员学习、讨论，民主选举了以叶振权为社长、以叶大贤、许锡光、林昌新、叶明忠、叶大妹等人为委员的社务管理委员会；同时提出“以社为家”、“爱社如家”的口号，结合生产、生活实际，经常性地向社员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教育。在生产管理上，主要是通过年度生产计划的制定，落实“水肥种管密”等先进农业科技措施，以促进增产；在财务管理上，即经过民主讨论，落实收提留（组织再生产资金）比例、劳资（劳即投劳力；资，即入社的土地、耕牛、农具、现金等）分成比例，以及劳动计酬，即评工记分方法等等。

工作组入驻冲口农业社半年多，由于工作的细致，因此社员的集体主义思想不断成长，爱社如家，投劳投资皆十分积极，生产蒸蒸日上，当年的稻谷、玉米和其它农作物都比入社前增产1至2成，社员户户增收，喜笑颜开。社长叶振权为此当选为七区“劳模”和县人大代表，嗣后又被县人代会选为出席省人代会的代表。

我县 1953—1956 年粮食生产和统购统销概况

● 翟从森

1957年8月27日,《桂林前进报》发表了我写的《从鹿寨看粮食统购统销》一文。当时,我在县财粮贸办公室任职,分管粮食、财政、税务、金融等部门的工作。这篇文章所报道的事实,可以说是我亲身经历的。近日重读旧作,往事历历在目。

生产和消费

鹿寨县 1953 年至 1956 年的粮食产量是: 1953 年 13865 万斤。1954 年 13397 万斤, 1955 年 11655 万斤。以 1953 年为 100, 1954 年是 96.6%, 1955 年是 84%, 1956 年是 104.6%。即是说, 除 1956 年合作化后比 1953 年增产 4.5% 以外, 1954、1955 两年因遭旱灾, 比 1953 年减产了 3.4%、16%。

这几年来农民的用粮(包括留粮和统销粮、口粮、种子和饲料)却是年年增加: 1954 年是 8586 万斤, 1955 年是 9751 万斤, 1956 年是 11554 万斤。以 1954 年为 100, 1955 年是 113.6%, 1956 年是 134.6%。即是说, 1955 年比 1953 年粮食生产减少 16%, 而粮食消费却增加了 13.6%, 而粮食消费却增加了 34.6%。

这几年来人口增加也很快。全县农业人口 1953 年是 158252 人, 1956 年即增加到 175530 人。增加的这 17278 人, 以 1956 年每人留 490 斤计, 需粮 846 万斤, 而同一时期的粮食只增加 636 万斤。

由于粮食消费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 因而国家征购的粮食逐年下降很大: 1953 年是 5170 万斤, 1954 年是 6117 万斤, 1955 年却减至 3637 万斤, 1956 虽有增产, 但还是减至 3508 万斤。

这 4 笔账告诉我们, 由于当时农业还很落后, 自然灾害无法根治, 因而粮食生产很不稳定, 不但增长不快, 遇上自然灾害还要减产。由于农民生活的改善, 人口的迅速增加, 农村粮食消费数量增加太快, 这已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国家对粮食的征购数量。但是, 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城市、工矿区人口增多, 经济作物区扩大, 全国每年又总有一些灾害, 因而需要国家逐年能掌握更多的粮食, 而不应该逐年减少。这一矛盾如何解决呢? 很明显, 农民们必须努力生产。用现代的话来说, 发展才是硬道理, 树立科学发展观。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国家和农民

我县农民 1953 年至 1956 年的 4 年中, 共卖给国家余粮 11042 万斤, 交公粮 7390 万斤(代金除外), 同一时期, 国家供应县内缺粮农民、城镇居民、学生和职工的粮食却达 11838 万斤, 只支援国家粮食 6591 万斤, 平均每一农业人口每年只支援国家粮食 90 多斤。即是说, 除统购粮外, 还把 796 万斤公粮也销给了县内人民。由于国家统一掌握了粮食, 制止了“秋收谷贱伤农, 夏荒谷贵伤农”。广大农民在连续两个大旱年中能够安然地度过灾荒, 真是千古没有

的奇迹。广大缺粮农民避免了粮价波动的中间剥削而得到的利益，更是无法统计其数。

全县4年来共交公粮7849万斤（包括代金），折4317000元。4年来，国家发放救济款315286元，投资兴修水利1362000元，修筑鹿（寨）中（渡）公路约投资135546元，发放贷款2413580元（当时仍有218万元尚在农民手中），这4项即达4226412元。即是说，农民交给国家的公粮，还不算文教卫生等项开支，就已经全部用于农民了。

国家这些投资，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很多。修建了二排河拦河坝和5个大水库，灌田33600万亩，其中新灌田17000亩。全县1953年只有中小学169所，学生15260人，而1956年即增至243所，学生27610人。至于正在兴建的炼铁厂、拖拉机站、榨油厂、粮食加工厂、壮文学校及两个电影队，哪一项不是为了提高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由此可见，广大农民出卖余粮和交的公粮，不仅对长远利益有利，对目前利益同样是有利的。

鹿寨县人民公社化始末

●沈光明

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8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人民公社好”的题词，8月26日，广西区党委发出《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后，中共鹿寨县委即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白”。至8月底，全县已将22个乡161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合并为长征（原黄冕、幽兰乡）、红旗（即城关、石路乡）、雒容、洛埠、跃进（江口乡）、龙江、拉沟、长田、四排、中平、吉云、寨沙、头排、三江、黄腊、平山、大阳、高坡等19个人民公社。其中规模最大的红旗人民公社，共5875户，27547人；最小的是高坡人民公社，917户，4480人。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各高级社转入公社的生产资料，一律归公社所有，债务由公社承担。历年的超支户超支的钱粮不用偿还，分空户分空的钱粮亦不再补给；社员1958年1月至8月的预支款，本着共产主义精神不再计较。所有生产资料入公社不再评价；农业社之间对原拥有的生产资料多了不偿还，少了不填补。

公社劳动生产，实行“军事化、战斗化”，按营连排班编制组合劳动力，常开展大协作、大支援，加班加点。各公社的劳力和物资，由县统一调动，有的只记账，有的无偿调拨。由于劳动收获、集体资产已与每个社员切身利益无关，因此基层干部、社员均不再关心集体生产，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工效均很低，为此一些公社对无故不出工者，采取“扣饭”的方法，以促其出工。

人民公社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即粮食供给制加工资等级制）。以村为单位开办集体食堂，粮食、油盐由集体供给，种菜由食堂承包。每人每月生活费2.8元，每人每年平均口粮250公斤稻谷。粮食由公社拨给大队，大队拨给食堂。食堂根据各户订出的计划做饭。粮食超支不补，节约归己。劳动工资分为七等：一等每月5元、二等4元、三等3.5元、四等3元、五等2.5元、六等2元、七等1元。据县委农村部1958年12月12日统计，全县办食堂1138个，农户47310户，占100%；办幼儿园152个，入园儿童4561人；办托儿所1858个，入托儿童17005人；办敬老院7个，入院老人210人；办缝纫组57个，洗衣组151个，理发组26个，浴室315个。

人民公社建立后，每个公社都发了9至12月份的工资，但未能按所定的等级足额发放，

每人每月发1—1.5元的有6个公社，发2—3元的有13个公社。

由于“一调二平”和“强迫命令作风”，严重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之自然灾害，造成农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社会物资奇缺。1960年上半年，大部份公社每天每人仅供应大米250克，有的只供应3市两，因此导致一些地方发生各种疾病，乃至浮肿而非正常死亡。

鉴于人民公社的缺陷，1961年鹿寨县根据中共中央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60条”，认真贯彻执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政策，明确生产资料所有权，确定“四固定”（即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固定）。生产队实行“劳动定额、多劳多得”，即与高级社基本相同的计酬方法。生产队的粮食除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外，所余者为社员的口粮和饲料粮。口粮实行“三、七开”（30%按劳动工分分配，70%按人定等定量分配）或“对半开”分配。这一政策，一直沿用至1970年。尽管1961年之后。农业实行“三级所有”，但区（乡、镇）人民公社之称谓仍沿用至1983年。此时段之所谓“人民公社”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仅有行政职权而无经济职权。直至1983年柳州地区在鹿寨进行“政、社分开”体制改革试点时，才将鹿寨全县的12个公社、105个大队、1627个生产队改为11个区和1个区级镇，即黄冕、中渡、平山、城关、雒容、江口、龙江、寨沙、拉沟、四排、头排和鹿寨镇（其中头排于1983年划归金秀县管辖）。至此，人民公社方告结束。

◆ 青春留痕 ◆

绿化鹿鹰公路

——回忆1958年“五四”青年节

●路 德

1957年，共青团鹿寨县委员会决定：发动县直机关、企业、学校和鹿寨镇、城关区和英山区机关、企业、学校的团员和青年，以及鹿鹰公路沿线的农村团员、青年，以绿化鹿鹰公路沿线的实际行动，纪念“五·四”青年节。

5月4日早上，天气晴朗。团员和青年们带上锄头、镰刀、铲子、水桶、手推车等工具，自带午餐，浩浩荡荡，开赴各自负责绿化的路段。

县直机关、企业、学校和城关区企业、学校、机关的团员和青年，街道及公路沿线窑上、石鼓、连珠、大村的团员、青年，由鹿寨方向从汽车渡口码头开始，沿公路两旁，向英山方向进军。而英山那边的植树队伍，向鹿寨方向挺进。

鹿英公路沿线，彩旗飘扬，歌声嘹亮，挖土声，欢笑声此起彼伏，非常热闹。由于大家积极努力，团结协作，互相支援，公交部门和林业部门及时运送树苗、进行人力调配，仅花了6个小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的两支植树大军，于当天下午在长盛坳顶胜利会师。长盛坳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声。

青年突击手



1952年土地改革后，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耕耘，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共青团组织发动团员带动广大青年，组织青年突击队，在互助合作运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大搞积肥运动、大搞植树造林和垦荒扩大种植面积、大力发展饲养业、推广新技术等方面，发挥了突击带头作用。做出巨大贡献的青年突击队员，被评为“青年突击手”。图为1956年鹿寨县出席广西青年突击手大会的全体同志合影。（路德）

在修筑鹿化铁路的日子里

●廖学敏

1958年，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办钢铁运动。当时，鹿寨钢铁厂（后改名鹿寨化肥总厂）要修筑一条从厂区连接湘桂线的铁路。这条铁路南起鹿寨火车站西边的岔道口，北至钢铁厂的中心，全长1.8公里，修筑路基土方工程由鹿寨中学承担。

那时是9月份，学校开学不久。学校宣布：停课一个月，高中部的9个班500多名师生，参加修筑铁路大会战。在“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鼓舞下，师生们日以继夜奋战，白天大干，夜晚加班干，吃在工地，休息在工地，挖方、填方、夯实，干得热火朝天。

开始的头三天，师生们日搭夜熬三个通宵，大家累得连走路都打瞌睡了。小休半小时，男的一边，女的一边，往草地一滚，就能呼呼入睡，哪管有没有蜈蚣和蛇。高一年级有个同学，由于疲倦加上瞌睡，打夯时一不留神，被木夯碰对头，血流满面。为了避免事故发生，学校宣布，从即日起，干到晚上10点多钟就收工了。

我们高四班承担的那段路基烂洋田。第一步得先清淤，把烂泥从水田里一桶一桶地舀出

来。那烂泥又粘又滑，像死铁一样重。泥浆把路搞得滑溜溜的，经常有人跌倒。我们累得精疲力竭，一个个像泥鬼仔，大花脸。

经过 5 天的苦战，烂泥终于清完了。接着又从别的地方挖来泥土往田里填，填一层，夯实一层。挑泥的比赛谁挑的大担，谁跑得快；打夯的“嗨——哟！嗨——哟”，号子声喊得响亮雄壮。我们这些学生哥真家伙“干劲冲天”，那时候大家就真的相信：中国马上就要跻身于世界钢铁大国的行列了，共产主义立即就要实现了！

我们班有个同学叫韦云程，闹阿米巴痢疾好几天了，却一直瞒着大家，拖着疲软的身子照样跟着干。直到便血了，我们才发现。班主任耿辉老师找他谈话：“你这样不要命地干下去，肠会穿孔的，会有生命危险！”他这才回校休息治疗。因此，韦云程元气大伤，那学期他一直很虚弱，走路软蔫蔫的，得了个外号叫“老软”。

经过一个月的奋战，路基终于完工了。那铺石碴、枕木、铁轨的工程，交给了铁路施工队负责。接下来，我们这 500 多名师生又马不停蹄，转战五里亭，为“钢铁元帅升宝帐”砍树、烧炭。

那个年月啊，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每当看到那条“鹿化铁路”，总令我感慨不已。

◆ 杏林春秋 ◆

鹿寨县医疗事业的演变与发展

● 覃德礼

鹿寨县域辖民国时期的雒容、中渡、榴江三县及修仁的四达和十锦乡。当时有 3 所县卫生院，总计医务人员 19 人，其中医师（士）6 人，护士 4 人，药剂士 2 人，助产士 3 人，卫生助理员 3 人，卫生稽查员 1 人。机构之少，人员之紧缺，实无法担当数十万人的疾病防治重任，致使全境瘟疫年年流行，出现百姓生病难求医的悲惨局面。

建国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疾苦，重视发展医疗事业，制订了“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四大原则。1951 年 6 月 30 日，鹿寨县人民政府决定，将上述三县卫生院合并成立“鹿寨县人民政府卫生院”，地址设在鹿寨镇南市街，用民房改建而成。院内分设医务课和防保课，分担医疗、防保任务。1953 年在西闸塘门外（现政军路 2 号）建设新址，此后延续扩建更新，不断增添人员及设备而壮大。1956 年 7 月 26 日，县人民政府卫生院改称“鹿寨县人民医院”，成为全县医疗中心。

1951年县卫生院仅有医务人员12人，1955年27人。1960年37人；1966年底，计有总人数61人，其中医护人员45人。科室设置为：1951年7个，1966年增至24个，包括门诊部有：内科、儿科、外科、妇产科、中医科、五官科、牙科、第二门诊部、放射科、中药房、西药房、药剂室、注射室、换药室、化验室、挂号收费室。留医部有：内儿科、外科、妇产科、手术室。总务后勤部有：总务科、财务科、供应科、被服修补室。

县人民医院的建立，医疗业务得到了迅速发展。外科在建院初期，仅能做阑尾炎切除、疝气修补、外部小肿瘤切除、创伤缝合等小手术。从1963起，已能施行腹部大中手术，如胃大部份切除、胃肠穿孔修补、肠胃空肠吻合、膀胱尿道取石等。1966年，实施胆道取石和植皮手术获得成功。其他科室的医疗业务均有所创新和发展。如内儿科1966年抢救中毒性消化不良12例，中毒性肺炎并心衰26例，中毒性痢疾9例，食物中毒12例，一氧化碳中毒5例，触电和溺水6例，均获成功。妇产科1960年已能施行妇产科手术，如子宫修补术、卵巢囊肿切除术、宫外孕取胎术等。1964年可施行剖腹产，1966年可施行子宫全摘除。五官科1966年施行甲状腺摘除术3例，扁桃体摘除术2例，均获成功。中医科从1959年至1966年间，先后开展穴位封闭治疗胃溃疡，针灸无痛分娩，中药治疗毒蛇咬伤和急慢性肝炎，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急腹症、针灸麻醉等效果明显。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县人民医院的基本建设逐步扩大。1953年，县财政拨款30000元，新建门诊部、病房及职工宿舍等4栋平房，总面积900平方米。1955年，再次拨款25000元，医院自筹资金10000元，购地皮8亩，增建病房1栋共800平方米。1965年，医院自筹资金17000元，新建妇产科病房和手术室，新增面积381.8平方米。至此，县医院初具规模，为进一步开展医疗业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

县人民医院的医疗器械设备也在逐年增加更新，朝着现代化迈进。1952年仅有丙种手术包1套、显微镜1台、手提式高压消毒锅1个、手术床1张等简陋设备，1961年增加了乙、丙两种手术包各1套、腹部手术包1套、显微镜1台、立式高压消毒锅2座、蒸馏水器1座、产床1张、空气麻醉机1台、电冰箱1台、干燥箱1座、牙科椅1张。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再次增添有计划生育手术包4套，乙、丙两种手术包各1套，产妇手术台1张，100—240毫安X光机1台，反光聚光灯1具，手摇离心机1台，救护车1辆。至此，已能基本适应当时开展医疗业务和急救的需要。

建国前，鹿寨、黄冕、龙江、洛埠、江口、运江、安安（今寨上村）、平山等乡（镇）设有医务所，只有所长1人，均为中医师，且薪金微薄。

建国后，榴江、雒容、中渡三卫生院就地改为区卫生所。1952年相继有平山、江口、四排成立卫生所。1956年，黄冕、龙江、屯秋、头排4个区建立卫生所。至1961年，卫生机构随着政社体制变更，增设拉沟、导江、城关、鹿寨镇卫生院，卫生机构遍及全县乡、镇（公社）；共有医务人员81人，担负着本地区医疗及卫生防疫工作，在全县范围内初步实现了初级保健目标。

建国前，广大农村缺医少药，走村串寨为群众看病者多为中草医，其中不乏巫医进行封建迷信活动，欺骗乡民，牟取财物。当时全县圩镇有中西医私人诊所8个，医务人员12人；有中药店铺28家，坐堂中医师19人。

建国后，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医药卫生人员的组织和培训。1952年有113人申请经批准开业行医。1953年至1966年，县卫生局共开办了培训班3期，受训人员共206人。

1953年开始组织“联合诊所”，至1956年，全县有西医联合诊所5所，中医联合诊所8所，共有员工71人，社会医药卫生人员283人。1957年，全县有中、西医联合诊所11所，员工64人；农业合作社卫生所37个，卫生人员149人，个体开业行医者38人。1959年，有人民公社集体办的大队卫生所113个，占大队总数的83%，共有医药卫生人员239人。至1966年，全县共有乡村医生464人，小队卫生员1035人，至此，医药卫生人员遍及全县各村屯，基本实现了“小伤小病不出村，一般疾病不出大队，常见病多发病不出公社”的医疗

体制。

普种牛痘 消灭天花

●汤英能

天花，是一种急性暴发性传染病。在旧社会千百年来未能控制，几乎年年都有发生，三至五年出现一次暴发性流行。婴幼儿夭折于天花病者不计其数，幸存者留下麻脸比比皆是，遗憾终身。1937年榴江县（现寨沙镇）、龙江乡天花流行，死亡200多人。其中寨敖村1937年以前出生的1074人中，有66人麻脸。1944年冬，修仁县十锦乡（今四排乡）石妙村天花流行，发病70余人，死亡过半。1949年冬再次流行，石龙村41户，家家有病人，其中18户死亡共18人。在四排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麻子姑娘麻子郎，麻子媒人背进堂，麻子爸妈受礼拜，满屋麻子闪金光。”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天花病的防治工作，把天花病列为24种传染病的甲类传染病，并居首位，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要求限期消灭。自1951年开始，每年都免费给新生儿接种牛痘。据统计，1951年接种49307人，1952年84286人，1953年34637人。1954年，在全县范围进行首次强制性普种牛痘，组织医务人员200多人，跑遍全县村屯，挨家逐户实施种痘，要求除麻脸和手臂有痘疤者外（已患过天花或种过痘，已获终身免疫），其余哪怕是百岁老人，都必须接种牛痘。当年共接种60180人。此后，每年都对新生儿和漏种者接种，计1955年28261人，1956年38598人，1957年36276人，1958年25000人，1960年6474人，1962年38500人，1963年17678人，1964年17853人。1965年冬至1966年春，第二次全面强制性普种牛痘，接种人数高达178760人。

由于政府重视，措施有力到位，鹿寨县自1952年始，再没有天花病例报告，经几年鉴别，认定已达消灭天花县份。1952年以后出生的人，再也找不到一个麻子脸。群众中流传着新的歌谣：“莫说麻子点点金，消灭天花喜临门；十年种痘结硕果，扭转乾坤谢党恩！”

（作者自1953年起在鹿寨县卫生科工作，历任科员、副科（局）长、局长职务，亲身组织、领导、参与种痘灭天花行动。1982年调柳州地区医院任副院长，1993年退休。）

◆ 教诲烟波 ◆

雒中忆旧

●杨 骥

国民党时期，雒容县教育十分落后，国民基础教育没有普及，中等教育只与毗邻的榴江县联合办了一所“榴雒联中”。联中校址设在鹿寨镇，学制两年，不开设英语课，是为了培养两县的农村小学师资而开办的。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雒容县鉴于县内学子，特别是贫困家庭学子求学之艰难，在社会贤达的推动下，采用各乡集资建校办学的办法，办了一所雒容县初级中学（简称雒中）。学制三年，开设英语课，以期学生毕业后能继续升入高中、大学，成为较高层次的有用之才。

雒中的校址设在城西洛清江左岸汽车渡码头的雒容新公园。校园宽阔，树木葱茏，环境优美。校舍于1946年建成，并开始招生。首招初中两个班，即第一、二班，学生约百名，男女生同班。其时，男生较多，女生较少。除少数富家子女外，绝大多数学生来自贫困家庭。入学时，学生文化程度不一，有高小毕业的，有未毕业的，也有仅读过几年私塾的。学生年龄亦悬殊很大，小的十二三岁，大的已为人父。因此，1946年秋，两个班的学生竟有近半退学，学校只好将两班合二为一，称“第一、二班”。之后，由于生源不足，每学期只招新生一个班，约50人，如第三班、第四班等等。

我是雒容洛埠街人。1944年秋，雒容沦陷时，跟舅父逃难贵州，入读贵州战时中学（招收难民子弟的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返回洛埠。1946年秋读雒中第一、二班，念初中第二册。开学不久，因脚疾休学。1948年复学时，入读第四班（初三册），1949年冬季毕业后，进入雒容县行政干校，直至参加工作。

我在雒中上学时，第一任校长为邬述彤，雒容县城厢乡龙婆村人。他卸任后，出任柳州高级工业学校（校址在柳州窑埠）任教导主任。第二任校长，印象不深，似是林振文，广东人，讲客家话。第三任校长为党玉琴，此人品质欠佳，为雒容地方人士不齿，后调任榴江中学校长，1955年肃反时被政府镇压。

雒中初创时，师资力量薄弱。在教师中，除本县高沙村的虞家礼是广西大学工科毕业生外，大多数是来自平乐、玉林和本县的高中毕业生，再加上学校没有什么教学设备，教师授课多是“照本宣科”，其教学质量可见一斑。尽管如此，雒中第一班、第二班、第三班、第四班与雒容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毕业的学生，后经党和国家的培养，许多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出类拔萃者有厅、处级干部、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中小学高级教师、副主任记者、副主任工程师等等。现在这批同学均已退休，有时聚会，谈及学生时代的难忘岁月，其情喁喁，其乐融融。

◆ 艺苑拾遗 ◆

鹿寨的文场、“文明戏”和“洋歌”

● 韦 仕

文 场

民国二年（1913年），我县中渡出现了一批文场“玩友”。李顺卿、李厚齐、黄贝生等人，堪称文场前辈。据说，李顺卿唱“过街溜”时，能反弹琵琶；黄贝生竟能一人双唱。至第二代（1917—1926年），中渡文场艺人辈出。传至第三代（1937年）中渡“国乐社”成立，钟

介然、刘耀勋为老师，向韦在纯等 40 余人传授文场技艺。在鹿寨地区，也同时出现不少文场艺人。其中，胡宗仁是琵琶高手，罗香亭有“吹活四箫”的美誉。在寨沙的文场艺人有梁乃老、黄子香、古大喜等。

文场，本是“耍坐场”的一种文艺演唱形式，其伴奏以弦乐为主，无须服装道具、舞台布景，深受百姓喜爱。1937 年，中渡“国乐社”刘耀勋等人，将《安安送米》、《金莲调叔》挂衣搬上舞台（即穿上戏服演出），形成了“文场戏”。1953 年，雒容县艺人庄国柱、骆秀玲等人，将《陈姑追舟》挂衣登上县文艺会演舞台，赢得了观众的交口称赞并获奖。至今，寨沙镇还保留着一个文场社——群乐社。

“文明戏”与“洋歌”

过去，群众把话剧称为“文明戏”，把区别于民间小调的“新潮”流行歌曲叫作“洋歌”。据说，“文明戏”和“洋歌”自“五四”运动后开始流传至我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一度活跃，我县各地学校普遍兴起演出“文明戏”和大唱“洋歌”的热潮。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大学生曾在中渡帮助组织“铁血剧团”，演出了《血祭一·二八》、《放下你的鞭子》、《青纱帐里》、《怪胎》等话剧，演唱《黄河大合唱》、《锄头歌》。英山小学师生演出《忠王李秀成》，大唱《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古怪歌》等等。特别是在四排、木料一带，在地下党韦纯束、李明、黄玉群等同志的领导下，通过学校上课、办夜校，发动师生大唱抗日爱国歌曲，宣传民众。木料村的群众曾拿起土枪、土炮，与日本鬼子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 人物画廊 ◆

壮族文人韦晓萍

● 沈光明

韦晓萍，谱名楫蕃，字用济。鹿寨县中渡镇寨上村人。壮族。生于公元 1917 年。2006 年，因病情恶化入住柳州市人民医院。同年 3 月 9 日，经柳州市柳北区党委病榻上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3 月 22 日辞世，享年 90 岁。

据《中国韦氏通书》记载：韦晓萍，少聪颖。幼承母教，口诵唐诗。11 岁，在元日（农历正月初一）之家宴上，遵父命以“春、新、人”三字为韵，即席口占《元日》七绝一首，云：“东风放荡又回春，柳绽梅开色色新。柏酒（作者注：即柏叶浸泡之酒。杜甫诗云：“飘零还柏酒，衰痴只藜床。”）浮香家灶暖，无钱争似有钱人。”深得其父嘉许。14 岁，入读桂林市桂山中学，当选为学生会委员，班刊主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16 岁，编著《国地理解表》一书，由桂林典雅书局出版。19 岁入武昌大学文学院教育系肄业，后毕业于中原大学政治学院。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韦晓萍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先后担任汉口《奋勉周刊》编辑，香港《天文台评论报》渝版总编辑，《民语报》总主笔，《褒贬周刊》（自办）社长兼主编，南京《建中周刊》主编，《文艺先锋周刊》编辑，新加坡《总汇报》特派员，《广西日报》驻京记者，济南《山东新报》（省级）特派记者、总编辑兼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部军简三阶（少

将衔)秘书,徐州《正义日报》特派员,《广西日报》总社主笔、副刊编辑主任,《广西日报》华南特派员、桂林分社社长及《新闻观察周刊》总主笔等职。其作品有:译著《日本经济解剖》,长篇小说《黄河之水天上来》,中篇小说《余生》、《血辙》、《风箱峡》、《黑货》、《穷巷里》、《年关》以及散文《袅娜集》、诗《蟹簪集》等等。曾当选中华全国文艺作家协会理事兼组织部长。

韦晓萍 1940 年入川,受时在巴县的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聘任为研究员兼实验学校主任。1941 年受聘为中国茶叶公司西北分公司业务考察员,遍历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内蒙诸省区,考察茶政,著政与边茶》一书。1942 年底,被国民党以“异党嫌疑分子”在兰州拘捕监禁,两年后解往重庆经保释出狱。之后,结识国民党监察院长于佑任先生及国民党高层人士吴稚晖、梁柏操、陈立夫、张道藩等人,深得于佑任先生奖掖,亲笔书赠“居天下之广厦,立于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条幅为勉。

1949 年 6 月,时任《广西日报》华南特派员的韦晓萍,在广西临解放时,于广州婉拒友人邀请去台湾、香港、新加坡工作,毅然转回桂林出任《广西日报》桂林分社社长及广西法商学校教授。桂林解放时,受人民解放军 49 军委派,随军南下家乡中渡县(今鹿寨县中渡镇)工作。1951 年 1 月,被推举为中渡县临时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大会主席。同年 11 月,调任柳州市人民政府秘书、学委会主任委员、中苏友协宣传组组长,两次被评为一等功臣。1953 年,受政治运动冲击,韦晓萍被送往农场“劳动改造”,之后留场就业。1957 年 12 月,转业回到榴州,以爱国人士身份被选为柳州市政协柳北区委员会常务委员、文教卫委员会副主任、文史资料工作组组长、《柳北文史》主编。历任四届共 14 年,年年受奖。1986 年,受聘主编《柳北区志》,历时 7 载完成,受柳北区政府奖励。1998 年,收集多年创作的旧体诗 300 多首,编成《雪泥诗剩》(第一册),由香港天马文图有限公司印行。1999 年,在《雪泥诗剩》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1994 年至 1887 年之新作 106 题 181 首,共 352 题 516 首,印行《雪泥诗剩》增订本(第二版)。韦之诗词,多为言志、记事、述怀以及歌颂中华山川风物之作,情感真挚、澎湃,文采斐然,于平淡中见奇,烱炙人口。因此,诗集印行后,即淬于广西乃至全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深受广大传统诗词爱好者关注和好评。2006 年,韦晓萍先生逝世后,以其为社长的柳州诗词学社之社友,为了纪念他“笔耕不辍,诲人不倦”之精神,交所能搜集到的他的诗词汇编成《雪泥诗途》一册,由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印行。

韦晓萍精于诗词楹联,曾被聘为柳州市楹联函授院、忻城县诗联学会、柳州诗词曲学会以及广西诗词学会顾问,被推选为《柳州诗词报》主编、柳州诗词曲学社社长。他常开讲座,为诗词曲学爱好者、后学者讲授作诗填词的基本知识,并悉心辅导其创作,为促进和激励传统诗词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仅柳州诗词学社的社友经其审阅、点拨、润色、作序推荐,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印行的诗词曲作品即达 54 部之多。因此,深受柳州市内外之诗人墨客的尊敬和爱戴。

韦晓萍热爱祖国雄奇绚丽之山川,在他的诗作中,不乏吟咏山川胜境之佳篇。他在游览家乡鹿寨名胜香桥岩、高岩时,都曾作诗题壁。其咏香桥岩之诗云:“山水钟灵造物奇,香桥胜景世间稀。青山俯卧横天过,白水潜流入地迷。洞古云深龙自隐,枝繁春闹鸟频啼。桃花人面红相映,雅兴来时几首诗。”重游雒容高岩之题诗云:“结伴郊原又畅游,草铺云径接清秋。入岩虎视真惊眼,穿洞蛇行漫举头。神女留香犹缱绻,相公遗墨自风流。劫余白象空寂寞,今古悲欢两未休。”

韦晓萍晚年长居柳州市,目睹柳州之山奇云诡而有感于柳州名士王启元“柳州山水甲天下,此天地开辟而已然矣”之悟言,因作《柳州山水吟》30 余首而鼓吹之)诗见《雪泥诗途 250 页》。其诗被有关部门选刻于风景胜地者,有雀儿山摩崖石刻,诗云:“果然似雀有奇峰,振羽欲飞势态雄;斜蹬沾云催挺足,高天吹气荡层胸。浓遮树暗一园绿,艳照霞明半壁红;放眼不知身是处,只缘人在画图中。”柳州蟠龙公园塔上也刻有韦晓萍的诗作,其诗云:“巍巍双塔仰头看,射斗文光龙与蟠;劈雾寻出劳步履,拂云访古任盘桓。徐翁游处添新景,王

氏山房复旧观；岭表名区多著意，登临更赏海天宽。”在柳州龙潭公园“雪龙胜迹”之石牌坊上，镌刻其撰写的楹联曰：

雷奋响天声，引来六合云烟，隐隐青山叠玉树；
龙飞通地气，留得千秋潭影，盈盈碧水泛金波。

柳州龙潭公园风雨桥悬挂之对联，亦韦晓萍先生之佳作，其联云

风过处，吹皱一池春水；
雨来时，画出四面秋山。

其文笔简练，文采飞扬，而又十分工整。

2002年7月24日，88岁高龄的韦晓萍先生还撰写一副246字的柳州第一长联悬挂于雀山民俗文化村畅情园的大门口，引起很多楹联爱好者的兴趣。其联曰：

畅游何处去，闹里寻幽，望雀山昂首欲飞，云烟飘渺。且喜园非旧貌，茂木参天，浓遮树暗森森绿。绿沾漫步，陂塘细草芊芊；枝头又听莺簧，宛转迎宾。才近芳村，最爱侬家苗舍，伴随拉鼓吹笙、踩堂捶布。齐漫舞，广舒彩袖缤纷。更打一碗油茶，慢斟适意，得趣赋诗联句，作画临书，都是雅人深致。莫辜负美景良辰，赏心乐事。

情结此间来，闲中访古，问马邑遗踪难觅。风雨苍茫，却看市换新颜，高炉矗地，艳照霞明灿灿红。红染回眸，艺圃繁花朵朵；叶底还摇翠扇，轻盈引路。方登竹阁，习亲壮俗瑶规，辟起斗牛抢蛋、爬杆踏刀。共欢歌，盛赞雄巾英武。再添三杯美酒，对饮开怀，勿忘奋发图强，与时俱进，原该志士应为。好护持久安长治，振业兴邦。

韦晓萍一生勤奋，兴趣广泛，学识渊博是诗人，是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是民俗学、方志学的学者。其生平事迹，已分别载入《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当代中华诗词家大辞典（华人卷）》、《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近代文学艺术人才纪录大全》等典籍。

黄埔军校鹿寨县同学会（鹿寨镇籍）名录

●陈胡雄 杨作宽

黄埔军校鹿寨县同学会，计有8名鹿寨镇籍同学：

马自纯 1915年生，水塔街人。1937年毕业于南宁“军事政治第一分校”，后就读于梧州广西大学理工学院。毕业后从事军工，任大校参谋等职。1948年回鹿寨镇创办穆斯林小学，任校长。1985年退休，1996年病逝。

廖大志 1917年生，水塔街人。1937年毕业于南宁“中央六分校”步兵科。曾任少校参谋主任等职。解放后，先后在杂货社、县编织社、县综合加工厂等单位工作。1984年退休。

付国栋 1919年生，水塔街人。1940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6期炮科，从事炮兵、观测、炮台工作，任少校参谋等职。

谢 祯 1911年生，南市街人。于“南宁军校六期炮兵学校”高等炮兵队毕业。1938年10月留校任教，后曾到八步公署、柳州团区、百色团区、黔桂边区从事军职，历任团副等

职。解放后在镇大众印刷社、劳动服务站工作。

易禹州 1914年生，码头街人。1937年毕业于南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第八期。曾任军粮库少校股长、广西保安中校谘议。解放后从事农业劳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区文史馆员。

黄海涛 1906年生，鹿寨镇人。1937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第二期步兵科。1944年在“遵义步兵学校”校官班学习。1937年至1946年在陆军18军11师任排、连、营长、团副等职。解放后，在县大米厂当工人。

冯德惠 1916年生，二兴村人。1934年于四川“中央军校”速训班六期步兵科结业。曾任陆军50军114师864团一营二连排长、连长。

徐永汉 1911年生，交通街人。1941年3月毕业于陕西“中央军校”七分校。曾任少校参谋。

更 正

1、《鹿寨文史资料》（第八辑）第40页倒数第4行，“于1950年6月底成立了以县委书记李云亭为主任……的土地改革委员会”应更正为“1951年6月底”

2、《鹿寨文史资料》（第八辑）第60页倒数第4行，“二营长武福有组织六连……昼夜反复搜刮”应更正为“昼夜反复搜剿”

3、《鹿寨文史资料》（第八辑）第74页倒数第6行，“马步水库……设计库容1327立方米”应更正为“1327万立方米”

4、《鹿寨文史资料》（第八辑）第78页第4行，“1958年5月，我在鹿寨县委办编辑内刊《鹿寨农村》”应更正为“1958年7月”；第80页倒数第8行“《干劲冲天报》在1958年6月初创刊”应更正为“1958年8月初创刊”

特向读者致歉